

# 1671到1672年英國水手Edward Barlow 的福爾摩沙觀察、記錄與地圖繪製

盧正恆

## 摘要

1671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遣三艘船隻出航東方，其中二艘前往鄭經統治下的臺灣，旨在建立官方的貿易關係。過往學術界有關此次前往的經過和雙方協商等，已有研究討論；其中一位參加航行任務的水手Edward Barlow留下日記、地圖等資料。他做為17世紀後期英國少數留下豐富素材的底層人民，是探索社會史的重要角色。他曾留下一段在臺灣、澎湖經歷的記敘及一張手繪地圖，將是本文考察的核心。本文指出，Barlow處在從上到下對於知識的追尋渴求以及整個社會風俗的巨大變革之際，雖然看來缺乏科學眼光，但充滿好奇心和求知欲的Barlow利用親炙現場觀察，描寫了有關鄭氏王朝統治下的臺灣與澎湖，並留下畫作。這些資料沒有提供「科學化」的知識紀錄，不過仍然展現了當時對這個尚陌生的王國之旅行書寫，及其異域的特性。

關鍵詞：英國東印度公司、東寧王國、鄭氏



# A Study of Edward Barlow's Observations, Records, and Mapmaking of Formosa between 1671 and 1672

Cheng-heng Lu\*

## Abstract

In 1671,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dispatched two ships to Taiwan, then under the rule of Zheng Jing, with the aim of establishing official trade relations. Previous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course of this expedition and the negotiations conducted between the two sides. Among the participants was a sailor named Edward Barlow, who left behind diaries, maps and other materials. As one of the few lower-class individuals in late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who produced such rich documentation, Barlow serves as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an exploration of social history. He recorded his experiences in Taiwan and Penghu and produced a hand-drawn map; these are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Barlow was situated in a broader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zed by a top-down desire for knowledge and by changing social customs. Although his observations do not provide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his firsthand accounts and drawing reflected notable features of travel writing about exotic lands.

**Keywords:**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Formosa, the Zheng Regime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 1671到1672年英國水手Edward Barlow 的福爾摩沙觀察、記錄與地圖繪製\*

盧正恆\*\*

## 壹、前言

鄭氏家族是臺灣史上極為重要的一段，不僅對臺灣的移民、制度與開墾歷史產生深遠影響，其政權的對外關係亦不容忽視。相關研究成果頗多，大致可分為兩大類：戰爭與貿易。前者代表性學者如歐陽泰（Tonio Andrade）、康培德等；<sup>1</sup> 後者則主要探討鄭氏政權與荷蘭、英國、西班牙、日本、大清與朝鮮等國的互動。學界研究已清楚指出，其對外關係奠基於貿易利益的維繫，並藉此穩固政權、擴張政治影響力與領土。其中，討論最為深入的對象無疑是荷蘭，其次則為

---

\* 本文部分內容曾以〈大清、「大英」、「大員」：比較帝國史與多語種史料下的鄭氏政權〉為題發表於2024年10月12到14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南市立博物館共同主辦之「荷蘭東印度公司與大員：十七世紀的東亞海域」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文將滿文部分的討論刪去，聚焦於Edward Barlow的地圖與日記。特別感謝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陳宗仁研究員在本文書寫過程中提出的建議與指正。本文為國科會「長十八世紀時期俄羅斯帝國的臺灣、東亞、太平洋水文調查與知識建構暨其源淵與影響」（113-2628-H-A49-003-）研究成果之一，特此說明。

收稿日期：2025年6月6日；通過刊登日期：2025年8月21日。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sup>1</sup> 例如Tonio Andrade, *Lost Colony: 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康培德，〈北臺雙東（東寧國與東印度公司）對峙下的臺灣原住民〉，《季風亞洲研究》，第1期（2015年10月），頁33-67。

西班牙與日本。

近年來，有關鄭氏政權與朝鮮之間關係的研究也逐漸增多。例如，羅樂然從韓國史學的研究脈絡出發，探討過去較少受到關注的清初朝鮮王朝如何因應海洋秩序重組，特別是其情報蒐集與應對方式。他指出，朝鮮士大夫對海洋秩序重整的理解，已不再是過去認知的消極海洋政策，而是展現出積極蒐集情報的態度，並期待中國恢復海禁，以維持朝鮮對日貿易的壟斷。<sup>2</sup> 同樣關注鄭、朝關係，雷雨晴則利用韓國史料，考察朝鮮如何透過燕行使、漂流民及日本等主要渠道，探聽有關鄭成功與清軍作戰，乃至鄭氏政權遷往臺灣等各類情報。其中，三藩之亂時期的情報蒐集最為關鍵，涵蓋勢力範圍、經濟與歷史發展等面向。雷雨晴認為，雖然當時朝鮮對地理位置的理解仍與實際存在極大落差，但錯誤已逐漸減少，並能依據所得情報對沿海地區進行新的安排。<sup>3</sup>

相較之下，有關鄭氏政權與英國互動的研究，雖已有紮實的研究基礎，但在1998年後便較少受到學界關注。最早探討鄭氏與英國貿易關係的學者，是賴永祥與曹永和，他們的研究成果至今仍具重要地位。1953年，曹永和抄錄了日本學者岩生成一於1931-1932年間謄寫、後由陳紹馨保存的《英國商館紀錄》（*Factory Records, China and Japan*）；此材料經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主任周憲文同意，並委請周學普翻譯，最終於1959年出版為《十七世紀臺灣英國貿易史料》。<sup>4</sup> 不過早在1954年，賴永祥即以這份材料為基礎，率先發表關於兩國通商的基本概況；<sup>5</sup> 隨後，他又針對鄭、英通商的歷史背景與過程，包含雙方締結和約、設立商館、貿易品及商船等，進行了完整且深入的研究。他認為，當時英國亟欲拓展在東亞的貿易，但受制於鄭氏的貿易制度、對清戰爭以及沿海遷界等因素，使得鄭、英

<sup>2</sup> 羅樂然，〈朝鮮士大夫對清初海洋秩序重組的情報收集與對應〉，《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34卷第3期（2022年9月），頁559-588。

<sup>3</sup> 雷雨晴，〈明清之際朝鮮王朝對臺灣鄭氏政權的關注與情報的應對〉，《漢學研究》，第42卷第2期（2024年6月），頁121-151。雷雨晴已於近期出版專書，可參見雷雨晴，《異域之眼：朝鮮王朝對臺灣鄭氏政權的認知與想像》（臺北：秀威資訊，2024年）。

<sup>4</sup>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十七世紀臺灣英國貿易史料》（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

<sup>5</sup> 賴永祥，〈鄭英通商略史〉，《臺灣風物》，第4卷第4期（1954年4月），頁13-26。

貿易始終無法達到雙方的預期。<sup>6</sup>

1984年，張秀蓉主要針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組織、制度、資料保存情況，以及與臺灣相關的資料目錄進行介紹，並列舉若干材料。<sup>7</sup> 曹永和又根據張秀蓉補充的資料，修正了先前抄錄的英國商館史料中若干錯漏之處。<sup>8</sup> 其後，林仁川也曾關注英國東印度公司與鄭氏的貿易關係，但其觀點並未超出賴永祥的論述。<sup>9</sup> 最後，楊佳瑜的研究則將重點放在1670-1674年的三藩之亂與鄭經參戰，並指出臺灣的國際經濟地位隨著地緣政治與商業形勢的變化而逐漸下降。<sup>10</sup>

上述研究大致勾勒出鄭、英關係的梗概，但基本上仍停留於20世紀以前所發現的檔案材料；進入21世紀後，因為缺乏新資料的挖掘，相關討論亦顯得略為停滯。此外，現存材料多出自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館檔案，其所提供的視野與觀點，致使既有研究多侷限於上層統治階級的描述。基於此，本文擬將視角向下移動，以1672年隨船隊造訪臺灣的英國水手Edward Barlow（1642-1706）所留下的日記和地圖為核心，探討17世紀中下階層群體對於異域的觀察，並以此作為理解17世紀臺灣如何被描繪的背景與基礎。

目前，Edward Barlow的日記完好地保存於英國格林威治皇家博物館（Royal Museums Greenwich），且部分原件已數位化，供讀者線上閱覽。<sup>11</sup> 2022年，筆者曾在一場演講中，將Barlow繪製的地圖與《臺灣略圖》進行比較與討論，這兩

<sup>6</sup> 賴永祥，〈臺灣鄭氏與英國的通商關係史〉，《臺灣文獻》，第16卷第2期（1965年6月），頁1-50。

<sup>7</sup> 張秀蓉，〈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中的臺灣史資料〉，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臺灣史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1994年），頁49-70。

<sup>8</sup> 曹永和，〈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臺灣鄭氏政權〉，收入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6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7年），頁389-405。

<sup>9</sup> 林仁川，〈清初臺灣鄭氏政權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8年第1期（1998年3月），頁8-15、38。

<sup>10</sup> 楊佳瑜，〈從英國東印度公司史料看鄭氏來臺後國際貿易地位的變化（1670-1674）〉，《臺灣風物》，第48卷第4期（1998年12月），頁19-50。

<sup>11</sup> 2024年，筆者曾赴該館查找資料，承蒙館員協助調閱檔案，讓筆者得以詳細閱覽包含地圖在內的檔案原件，據以完成此文。

幅地圖是目前所知少數於鄭氏時期繪製的地圖。<sup>12</sup> 此圖亦收錄於2023年鄭維中出版的《島嶼超展開》一書中，書中指出，當時鄭氏雖已安居臺灣，但倉促上臺的領袖鄭經仍帶有模糊與不確定未來的徬徨感；該圖也因此引起相當的關注。<sup>13</sup> 此前，鄭維中曾利用Barlow的紀錄，以1934年Basil Lubbock的鉛字本為主要材料，對日記中描繪的印度洋與東南亞魚類圖畫進行論述。<sup>14</sup> 然而，目前尚未有學者針對日記書寫者的地理空間、知識來源與建構等方面進行研究。

根據旅行書寫（travel writing）的研究指出，旅行書寫是一種型塑帝國時代歐洲人對那些被探索、入侵、投資或殖民土地的所有權威（sense of ownership）與熟悉感（familiarity）的文學形式。它不僅能激發人們對未知空間的好奇與冒險精神，還透過歐洲視角敘述異國風情，使公眾支持帝國野心，並成為建構「帝國的國內主體（domestic subject of empire）」的關鍵工具，使讀者彷彿也參與全球征服計畫。<sup>15</sup> 這一特質在Barlow的日記中可見端倪，但直到1934年鉛字本出版後，才具有更廣泛的公共性質；此前，這些好奇心與熟悉感主要存在於Barlow個人身上。因此，透過分析其日記與圖繪，有助於反映當時英國許多製圖師與水文師在面對海外知識、地理與水文調查的轉折期時，所獲得的第一手觀察。<sup>16</sup>

簡言之，過往有關英國與鄭氏關係的研究，自曹永和、賴永祥以來，主要仰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館檔案，梳理鄭氏政權和英國東印度公司之間的貿易制度

<sup>12</sup> 該場演講為2022年4月29日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之演講「間諜與商人視野下的鄭氏政權：《臺灣略圖》與Edward Barlow Map為中心」；此外，雖然目前尚未找到此前是否有學者曾利用這幅地圖進行研究，但是至少國立故宮博物院蘇峯楠助理研究員就曾在2022年之前於一場演講中利用過該圖，感謝蘇助理研究員告知。

<sup>13</sup> 鄭維中，《島嶼歷史超展開：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人們與臺灣》（臺北：春山出版，2023年），頁240-244。

<sup>14</sup> 鄭維中，〈烏魚、土魷、虱目魚：多元脈絡下荷治至清領初期臺灣三種特色海產的確立〉，《臺灣史研究》，第25卷第2期（2018年6月），頁32-33。

<sup>15</sup>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 3-4.

<sup>16</sup> 當然，有關17-19世紀有關臺灣的旅行書寫之研究，不能不提到莊勝全與鄧津華的研究，可參閱莊勝全，《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識》（臺北：稻鄉出版社，2013年）；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與商議過程。在鄭氏時期，由於臺灣遠隔外海，大清通過各種降將與間諜打聽消息；<sup>17</sup> 朝鮮則透過漂流人員或信使打聽臺灣的軍事情報與地理形勢；<sup>18</sup> 日本則經由風說書來理解鄭氏政權。<sup>19</sup> 而Edward Barlow作為一名從農村走入城市、再乘船遠渡海外的英國水手與庶民，他所留下的資料蘊含豐富的社會史面貌。透過探索他隨船隊造訪鄭氏統治下臺灣所遺留的素材，可跳脫以往賴、曹的研究視角，改以「微觀」的視野來看待這段歷史。<sup>20</sup> 受益於近年來對異域認識的相關研究啟發，本文將聚焦於Barlow所繪製的福爾摩沙地圖和相關日記記述，探索不同時期臺灣的樣貌。

## 貳、Edward Barlow與彼時英國社會、知識、文化氛圍

在細究本文欲分析的地圖與資料之前，有必要先理解其所處的時代背景。本文主角Edward Barlow出身於英格蘭農村，一生致力於擺脫貧困束縛。受時代與環境影響，他同時也是一名關注異國文化的觀察者。作為一位航行世界各地、得以親眼目睹「他者」的水手，他對異域風俗與文化尤為留心。<sup>21</sup> 本節將從時代背景

<sup>17</sup> 盧正恒，〈賊謀四出廣招徠：鄭氏謀報網、清帝國初期的東南海島認識與《臺灣略圖》〉，《臺灣史研究》，第26卷第1期（2019年3月），頁1-58。

<sup>18</sup>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顯宗實錄》，第18卷（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年），頁29。

<sup>19</sup> 松冬方子著，杉本房代譯，劉序楓校修，〈唐、蘭風書中有關鄭氏政權瓦解的訊息及其傳日經過〉，《臺灣史研究》，第19卷第1期（2012年3月），頁173-192。

<sup>20</sup> 雖然不見得是否仍適用於現在史學發展和觀點，不過此文當中的微觀或社會史傾向以及研究的方法，應該仍可符合文化史的脈絡；有關文化史與新文化史的研究發展，可參見夏提葉（Roger Chartier）著，楊尹瑄譯，〈「新文化史」存在嗎？〉，《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5卷第1期（2008年6月），頁199-214；周兵，〈Peter Burke之新文化史〉，《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第45卷第4期（2007年12月），頁53-94；陳建守，〈文化史的由來、實踐及意義——介紹兩本討論文化史的著作〉，《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第44卷第2期（2006年6月），頁243-267。

<sup>21</sup> Peter Earle, "The Origins and Careers of English Merchant Seamen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and Early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Cheryl A. Fury edit, *The Social History of English Seamen, 1650-*

與其人生經歷出發，勾勒Barlow所面對並親身體驗的英格蘭社會與文化氛圍。

17至18世紀常被稱為「長十八世紀」(long eighteenth century)，這段時期不僅是英國史的重要轉折，也是全球史的關鍵時刻。英國通過一系列深刻的變革，呈現出嶄新的面貌，並對世界歷史產生劇烈影響。<sup>22</sup> 斯溫·貝克特(Sven Beckert)指出，1670年代可視為英國戰爭資本主義(war-capitalism)的萌芽階段。<sup>23</sup> 同時，更值得注意的是，約翰·布魯爾(John Brewers)挑戰傳統觀點，主張1660至1760年間的變化，遠比1650至1750年或光榮革命之後的轉型更加深刻。自17世紀中葉以降，英國的統治者逐步改由國家主導戰爭，全面掌控並整合資源，因而在與其他競爭對手的較量中佔據明顯優勢。憑藉高額稅收、日益壯大且制度化的民事行政機構，以及常備軍隊，英國逐漸發展為一個「財政軍事國家」(British fiscal-military state)，並在17世紀末形塑出嶄新的「不列顛國家」(British State)。<sup>24</sup>

隨著英國向外拓展的腳步愈趨劇烈，也帶來知識的交流與更新，其中有關地理空間與世界觀的新資訊尤為核心。當時英國對空間的技術與理解，主要體現在地圖的編繪上。17世紀的帝國建設(empire-building)中，特別是在邊界模糊、領土重疊的地區(如美洲)，地圖不僅是描述空間的工具，更是政治權威和主權的象徵。歐洲各帝國透過為大西洋沿岸的領土命名，來標示帝國邊界並描繪遙遠土地的特徵，進而使地圖成為殖民與認識領土的核心媒介。許多商人與旅者出於不同目的，往往會資助繪製包含交通路線、聚落分布、經濟活動與港灣設施等特徵的地圖，以協助國家在主權宣示的競爭中取得優勢。學者的研究也提醒我們，來往邊疆地區的人群，其經驗與抉擇成為國家理解並管理不斷擴張領土的重要基

---

1815 (Suffolk: Boydell & Brewer, Boydell Press, 2017), p. 131.

<sup>22</sup> 有關於長十八世紀的幾起案例與討論，可參見邱岡彥、黃柏源主編，《浩蕩英華：長十八世紀的英國文藝與歷史》(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3年)；又，這一段時間社會逐漸進入庶民的時代，社會進入成熟的階段，朝向現代社會樣貌前進著。參見島田龍登編，游韻馨譯，《1683年：近世世界的變貌》(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頁39-43。

<sup>23</sup> 可參見Sven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4).

<sup>24</sup> John Brewers,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pp. xiii-xviii, 3, 21-24, 137, 165.

礎。這些來自遙遠邊地的地圖，最終在倫敦被重新製作與研究，逐漸形塑出帝國對自身疆域的認識。<sup>25</sup> 無論是地圖繪製者以科學化方式描繪，抑或源自旅者的記錄與草繪，都反映了這一時期英國建構邊疆認知的重要環節；然而，少見的是出自「個人」主觀意象或觀察所繪製的地圖。

自17世紀起，人們對於自然和新知的追求，已不能在傳統的教育體制中獲得滿足。在英國，內戰所造成的社會秩序混亂，反而讓探索自然知識成為另一種需求的慰藉。1645年，學者們開始自發性組織討論會；1660年，科學家與自然知識的追求者更進一步成立學會，並於1662年獲得查理二世頒發的特許狀與支持，象徵王室對於科學事業的承認與支持。該學會於1663年正式成為「英國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sup>26</sup> 無論是英國皇家學會，或隨後建立的大英博物館，皆是這一時期的指標性機構。<sup>27</sup> 它們不僅代表各種新知識的傳播與累積，也推動了科學調查的展開，使實驗性的探索逐漸獨立於政治與宗教之外，從而奠定了現代科學的基礎，並成為塑造時代氛圍的重要力量。

17世紀中葉以後，從王公貴族到商人、水手與出版商，都習慣將地圖公開展示在家中最顯眼的位置，以便來訪者一眼可見；有些人甚至擺放地球儀等物品，將地圖與製圖成果視為一種可供展示的知識物件（object），以符合社會風尚。<sup>28</sup> 各階層掀起收集地圖（map、atlas）、地球儀（globe）、以及磁化模型球（terrella，即拉丁文的「小型地球（little earth）」）等展現世界地理知識產物

---

<sup>25</sup> Christian J. Koot, “The Merchant, the Map, and Empire: Augustine Herrman’s Chesapeake and Interimperial Trade, 1644-73,”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67: 4 (October 2010), pp. 604-605, 643-644.

<sup>26</sup> 姜鵬飛，〈歷史上的英國皇家學會〉，《歷史月刊》，第240期（2008年1月），頁4-11。

<sup>27</sup> 1687年，漢斯·斯隆（Hans Sloane, 1660-1753）開始蒐集西印度群島的動植物標本，由於其對知識之渴求，不僅促進了對動植物和各種物品的系統性分類，更進一步致力於推動既可保持原樣、又可提供市民大眾一個瀏覽及吸收異域知識的場域。1753年，在漢斯的遺願下，大英博物館的法源在國會通過。1759年大英博物館對一般民眾開放，讓科學知識更能傳遞給普羅大眾。參見井野瀨久美惠著，黃鈺晴譯，《大英帝國的經驗：喪失美洲，帝國的認同危機與社會蛻變》（新北：八旗文化出版，2018年），頁268-270。

<sup>28</sup> Phillip Koyoumjian, “Ownership and Use of Maps in England, 1660-1760,” *Imago Mundi*, 73:1 (March 2021), pp. 32-45.

的熱潮。當時，這類地理知識被視為比神學或《聖經》所描述的空間更具務實價值，體現了新時代的精神。在這樣的脈絡下，本文主角Edward Barlow亦身在其中。1663年，他曾贈送一顆小型磁化模型球給海軍部秘書、同時也是皇家學會會長的山謬·皮普斯（Samuel Pepys, 1633-1703）。這段插曲被學者視為英國強化海洋地理知識的象徵性案例之一。<sup>29</sup> 至1670年代，英國更開始積極推動海外地圖測繪、探索與水文調查（hydrography），而這些工作皆仰賴大量的實地測量。<sup>30</sup> 這不僅反映了當時對外探索中知識蒐集的普遍現象，也顯示出Barlow作為其中一員，正深深嵌入這股社會脈動之中。

英國與荷蘭在17世紀晚期因金融革命而經歷深刻的轉型，展現出不同於其他歐洲地區的優勢，凸顯了商業社會的特徵。金融改革對社會產生了多重影響，其中出版業的擴張尤為顯著，不僅反應了商業社會的結構，也意味著閱讀人口的增加、思想社群的擴展與彼此對話（當然也包括論辯與攻訐）。<sup>31</sup> 在這一現象中，與地理資訊相關的案例可見於Edward Barlow出航的1671年。此時，John Seller（1632-1697），原為航海設備製作者，後來成為首位與荷蘭地圖出版商正面競爭的英國地圖繪製與出版者。<sup>32</sup> 由於他致力於出版各式世界與分區地圖，累積了豐厚的成果，因此在1671年3月24日獲詹姆士二世（James II, 1633-1701）任命為「國王的水文師」（hydrographer to the King）。Seller不僅是實務航行經驗與水文調查的重要出版者，其資料更旨在協助航海家從英格蘭前往世界各地，打破荷蘭在地理與航海知識上的壟斷。1671年，他出版了被視為教科書的經典著作*The*

---

<sup>29</sup> Helen M. Wallis, “Geographie is Better than Divinitie: Maps, Globes, and Geography in the Days of Samuel Pepys,” in Norman J. W. Thrower edit, *The Compleat Plattmaker: Essays on Chart, Map, Globe Making in England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 1-43.

<sup>30</sup> Thomas R. Smith, “Manuscript and Printed Sea Charts in Seventeenth-Century London: the Case of the Thames School,” in Norman J. W. Thrower edit, *The Compleat Plattmaker: Essays on Chart, Map, and Global Making in England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p. 45.

<sup>31</sup> Beverly Lemire, ““Men of the World:” British Mariners, Consumer Practice,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an Era of Global Trade, c. 1660-1800,”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54:2 (April 2015), p. 299.

<sup>32</sup> Coolie Verner, “John Seller and the Chart Trad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Norman J. W. Thrower edit, *The Compleat Plattmaker: Essays on Chart, Map, and Global Making in England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pp. 127-128.

*English Pilot*北部篇（Northern），並自豪地稱其「配備了新的且精確的航海圖、海圖與說明；這些均來自英國國家內多位有能力且經驗豐富的航海專家的實踐與經驗」。<sup>33</sup>翌年，他又出版了南部篇（Southern），並規劃了東方（Oriental）、西印度（West India）等分區的後續計畫。<sup>34</sup>

與此同時，1672年出版的*The Coasting Pilot*與1675年出版的*Atlas Maritimus*，除收錄具航海指引性的資料外，也包含了許多海圖。其實更早在1669年，John Seller就已出版*Practical Navigation*一書，詳細說明各種航海器具的使用方式與經緯度標記，並持續修訂。例如在1676年的版本序言中，Seller即自述：「我增添了一些我認為必要的內容，以更好地調整此書，使其更適合海員使用，並在實際操作上更具可行性。」<sup>35</sup>因此，以1671年英國地圖製作的指標人物John Seller為例，雖然在相當程度上仍依賴抄錄、複製荷蘭海圖，但已逐步加入更多自行測繪的資料並付諸出版。<sup>36</sup>

在Seller之後，英國又出現了如John Thornton等水文師與製圖師。不過，正如Seller曾宣稱其資料源自多位英國探險家的實地探勘，在這樣的脈絡下，一位極具代表性的航海家便是與Barlow相識的William Dampier（1651-1715）。他是17

<sup>33</sup> Coolie Verner, "John Seller and the Chart Trad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p. 156.

<sup>34</sup> Coolie Verner, "John Seller and the Chart Trad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p. 146.

<sup>35</sup> 原文為：「Also with some additions that I judged necessary, for the better accommodating the Book, and rendering it more generally practicable for the use of sea men」。參見John Seller, *Practical navigation*, accessed May 26, 2025, [https://archive.org/details/bim\\_early-english-books-1641-1700\\_practical-navigation\\_seller-john\\_1676/page/n5/mode/2up](https://archive.org/details/bim_early-english-books-1641-1700_practical-navigation_seller-john_1676/page/n5/mode/2up).

<sup>36</sup> Coolie Verner, "John Seller and the Chart Trad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Norman J. W. Thrower edit, *The Compleat Plattmaker: Essays on Chart, Map, and Global Making in England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p. 127. 例如*Atlas Maritimus*所收錄的全球地圖中，Formosa是中國沿岸唯一的巨大島嶼。Jacob Robyn, "Terrarum Orbis Tabula," *Atlas maritimus, 1682*, INTERNET ARCHIVE, accessed May 23, 2025, [https://archive.org/details/bim\\_early-english-books-1475-1640\\_atlas-maritimus-\\_robyn-jacob\\_1682/page/n7/mode/2up](https://archive.org/details/bim_early-english-books-1475-1640_atlas-maritimus-_robyn-jacob_1682/page/n7/mode/2up)；1675年出版的*Atlas Maritimus*一書中也畫出了Formosa，並且在南側畫出明顯的缺口，標註Tanyow。John Seller, "A Chart of the Eastermost part of the East Indies," *Atlas maritimus, 1675*, INTERNET ARCHIVE, pp. 76-77, accessed May 23, 2025, [https://archive.org/details/bim\\_early-english-books-1641-1700\\_atlas-maritimus-\\_seller-john\\_1675/page/n75/mode/2up](https://archive.org/details/bim_early-english-books-1641-1700_atlas-maritimus-_seller-john_1675/page/n75/mode/2up).

世紀末英國重要的探險家、海盜、航海家與博物學家，自1670年代後期至1680年代間多次遠航世界各地，至1710年代時更已完成三次環球航行。他於1696年出版的*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引起廣泛關注，其中不乏延續自Seller以來、強調「親身探索與實踐」的重要論述。例如，Dampier於1687年自廣東上川島（St. John Island）出航時，曾遭遇生平罕見的狂風，隨後穿越東沙群島（Prata），並抵達澎湖：

因此，我們全然仰賴那些海圖，而那些海圖僅僅告訴我們某些地方或島嶼的大致位置，卻絲毫沒有說明那裡有什麼港口、航道或海灣，也沒有提到那裡的物產、軍力或貿易情況；這些資訊我們都得自己去探索。<sup>37</sup>

這一段文字再次凸顯，自1670年代以降，英國航海家與探險家在拓展地理空間認識方面所展現的努力與實際行動。

本文主角Edward Barlow的日記和旅程，必須置於上述文化與社會氛圍的脈絡下來理解。他的日記是窺視17世紀英國庶民生活與海外經驗的重要素材。正如學者所言：「他的精采日記（journal）打開了一扇窺視17世紀晚期海上生活的窗。」<sup>38</sup> 例如，Beverly Lemire透過考察「長十八世紀」英國水手的活動，從文化、習慣、衣著等面向，揭示了物質文化變遷（cultural change）的現象與影響；在這樣的分析中，Barlow的經歷即為重要案例之一。然而，由於他在臺灣期間留下的相關的訊息有限，因此並未成為Lemire的研究重點。<sup>39</sup>

---

<sup>37</sup> 原文為：「[T]herefore all our dependance was on the Drafts, which only pointed out to us where such and such places or islands were, without giving us any account, what harbour, roads, or bays there were; or the produce, strength, or trade of them: these we were forced to seek after ourselves」。參見William Dampier, *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 416, INTERNET ARCHIVE, accessed June 19, 2025, <https://archive.org/details/newvoyageroundwo00damp/mode/2up>.

<sup>38</sup> Peter Earle, “The Origins and Careers of English Merchant Seamen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and Early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Cheryl A. Fury edit, *The Social History of English Seamen, 1650-1815*, pp. 129-130.

<sup>39</sup> Beverly Lemire, “‘Men of the World:’ British Mariners, Consumer Practice,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an Era of Global Trade, c. 1660-1800,”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54: 2 (April 2015), pp. 288-319.

除了前述鄭維中對魚類的研究之外，環境人文學者也利用Barlow的經歷及其日記中關於動植物、風暴與海洋經驗的記載，作為探討人與自然互動的重要素材。<sup>40</sup> 同時，海員在航行途中私自攜帶貨物進行買賣，若與公司在利益分配上產生爭議，往往會訴諸法律，因而為法律史學者提供了研究17世紀水手如何尋求待遇補救的重要線索。這些研究指出，水手在多數情況下仍是海上與法律制度下的受害者。<sup>41</sup> 換言之，Barlow的經歷成為理解特定時期底層社會人群的一個典型案例。

Barlow出生於英格蘭蘭開夏郡（Lancashire）曼徹斯特（Manchester）北部的普雷斯特維奇（Prestwich），家中共有八口人，包含五位兄弟姐妹，出身貧苦農戶。他的父親年收入僅有8至9英鎊，約為當時的平均水準，難以支撐全家生計。由於家庭資源有限，Barlow的兄姐不得不外出工作以減輕負擔，而這也因當時商業社會與製造業的發展，使農村子弟有了進入勞動市場的可能。Barlow也走上了相似的道路。他的工作經歷相當多樣，曾在紡織工坊當學徒。這與當時許多出身清寒的青少年相仿——大約在15至24歲便離家進入勞動市場，以補貼家計。然而，由於缺乏技術與體力，他們往往只能從事低薪且勞累的工作。<sup>42</sup> Barlow在父母安排下成為學徒，但在首次獲得短暫假期返家後，便深感這份工作並非他的歸宿。他因此決意離開曼徹斯特，前往倫敦尋找更多機會。這種無法適應學徒生活的情況，在彼時的英格蘭貧農家庭子弟中並不罕見，他的親哥哥便是另一個例子。<sup>43</sup>

在倫敦，Barlow並非一帆風順，反而歷經一段艱辛的歲月，最終不得不依靠原本並不想投靠的叔叔。<sup>44</sup> 他移居至南華克（Southwark）——與倫敦隔著泰晤士

---

<sup>40</sup> Steve Mentz, “‘Making the Green one Red:’ Dynamic Ecologies in Macbeth, Edward Barlow’s Journal, and Robinson Crusoe,” *Journal for Early Modern Cultural Studies*, 13:3 (January 2013), pp. 66-83.

<sup>41</sup> George F. Steckley, “Litigious Mariners: Wage Cases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dmiralty Court,”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2:2 (June 1999), pp. 315-345.

<sup>42</sup> Ilana Krausman Ben-Amos, *Adolescence and Youth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9-68.

<sup>43</sup> Ilana Krausman Ben-Amos, “Failure to Become Freemen: Urban Apprentice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Social History*, 16:2 (May 1991), pp. 155-172.

<sup>44</sup> Ilana Krausman Ben-Amos, “Gifts and Favors: Informal Suppor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The*

河相望、遠遠可見倫敦塔之處——並以驛遞員等職務維持生計。1659年，在叔叔的牽線下，他與海軍辦公室（the Navy Office）簽訂契約，正式展開水手生涯。那麼，為何一位自農村成長的青年會選擇成為水手？原因或許並非源自對海洋的熱忱，而是因為航海事業能夠帶來更高的經濟報酬。在17世紀中期以前，多數水手與漁夫傾向前往荷蘭，因該國對海洋勞動力的需求最大。然而自中期以降，隨著英格蘭本身的海事需求日益增加，加上薪資優渥、訓練相對輕鬆，迅速吸引了大批勞動人口。特別是在1650年代的英荷戰爭之後，英格蘭對水手的需求急遽上升，航海業更出現大量就業機會。<sup>45</sup>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Barlow開始了他的海上生活。在其職業生涯中，他曾兩度航行至地中海、兩度前往加那利群島、三度赴印度、四度到訪西印度群島，並五次航行至中國沿海。<sup>46</sup>

然而，海上生活並不輕鬆。Barlow在1659至1701年間從事超過40年的航海生涯，多次在受傷與險境中倖存，並兩度淪為戰俘——其中一次便是在離開福爾摩沙後的回程時遭荷蘭人俘虜。他日記中記錄，船上食物品質極差，經常腐敗，每日僅能休息4小時，甚至抱怨倫敦的乞丐或許都過得比他好。<sup>47</sup> 雖然隨著經驗累積與職級提升，薪資有所變動，但他最初三年航行時，月薪僅約19先令（shillings），屬一般船員的基本收入。<sup>48</sup> 除了固定薪資外，他也會在航程中攜帶貨物進行私人貿易，數量還不少，為他增加了不少外快。<sup>49</sup> 每次返抵英格蘭，他都能短暫享受愉快時光，但所賺薪資往往很快揮霍一空，迫使他再次登船謀生。<sup>50</sup> 事

---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2:2 (June, 2000), pp. 295-338.

<sup>45</sup> Bernard Capp, "Naval Seamen, 1650-1700," in Cheryl Fury edit, *The Social History of English Seamen, 1650-1815*, pp. 33-49.

<sup>46</sup> Charles Carlton, *This Seat of Mars: War and the British Isles, 1485-1746*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07-208.

<sup>47</sup> Charles Carlton, *This Seat of Mars: War and the British Isles, 1485-1746*, p. 207.

<sup>48</sup> Ralph Davis, *The Rise of the English Shipping Industr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14. 當時，1英鎊大約等同20先令，因此Barlow在海上只需要8到9個月，就已經差不多等同其父親的年收入。

<sup>49</sup> Earl H. Pritchard, "Private Trade between England and Chin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2 (August 1958), p. 239-240.

<sup>50</sup> Titas Chakraborty, "Desertion of European Sailors and Soldier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Bengal," in Marcus Rediker, Titas Chakraborty, and Matthias van Rossum edit, *A Global History*

實上，追求更高報酬正是他最終決定登上前往福爾摩沙船隻的兩大主因之一。

簡言之，英國在1670年代逐漸嘗試擺脫荷蘭在世界地理與航海路線知識上的壟斷，轉而展開自主的調查、繪圖與出版，而最能反映此一實踐的案例，大概就是John Seller。他身為當時國王任命的水文師，雖未完成*The English Polit*的大部分篇章，但已規劃續作，並納入前往廈門的航程（但未及澎湖或臺灣——也暗示Barlow的另一個登船動機）。Seller不僅出版海圖與航海實務書籍，亦身兼航海器具的製作者與販售商。他的著作與製品中可清楚看見科學化的痕跡，並自豪這是來自實際航海調查的成果。Seller的出版事業，本身即是知識框架重塑、荷蘭競爭、海外探險，以及英格蘭在經濟、社會、政治與科技氛圍下各種變革的產物。

對異域世界知識的渴求，使得地圖成為當時從國王到平民百姓皆重視的象徵物，既陳列於宮廷，也可見於普通住家。然而，這種景象或許容易導致一種誤解：彷彿英國對地理空間的認識皆來自嚴謹的科學製圖與水文調查。事實上，多數參與海外活動的人並非受過專業科學訓練者。當時英國正處於前工業化（pre-industrial）的轉型期，製造業的興起、生產專業化與家庭製造業的發展，構成了Barlow等人得以離開農村，進入手工業學徒體系，並最終成為水手的重要背景，從而擺脫農田或家務勞動中循環不斷的「生命週期」（life-cycle service）。<sup>51</sup>即便水手待遇不佳，但隨著海外活動需求日增，航海仍成為許多年輕人的選項。他們並未具備Seller所代表的「科學」訓練，其所描繪的世界，更應被理解為旅行書寫下的一種知識建構。

---

*of Runaways: Workers, Mobility, and Capitalism, 1600-185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9), p. 85. 根據他留下來的素材，我們幾乎可以一窺英國船隻航行在西印度洋、地中海、東亞海域上的狀況，包括船隻負重、價格、船員待遇以及私人帶貨前往販賣等細節，體現了絕佳的個人經驗。參見Ralph Davis, *The Rise of the English Shipping Industr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pp. 333-343.

<sup>51</sup> 陳禹仲，〈金融革命與商業社會的興起：18世紀初期英格蘭的社會轉型〉，《史繹》，第38期（2014年6月），頁87-124；陳建元，〈丹尼爾·笛福論風俗改革運動及其改進之道〉，《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67期（2022年6月），頁153-212；Robert Brenner and Christopher Isett, “England's Divergence from China's Yangzi Delta: Property Relations, Microeconomics, and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2 (May 2002), pp. 617-651.

### 叁、Edward Barlow的福爾摩沙、大員與澎湖地圖

臺灣從未被納入英國的正式帝國（formal empire）或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範疇。它既曾是荷蘭的殖民地，又被視為可能成為通往中國、日本貿易的重要節點；在鄭氏政權的控制下，臺灣亦為英國開拓市場提供了契機。實際上，早在17世紀20、30年代，英國已透過翻譯荷蘭等國的資料，包括地圖、旅行者記錄與筆記文集等，對臺灣建立起初步認識。當時市面上流通著不少關於「臺灣／福爾摩沙」的知識，其中影響尤為深遠的，應是甘治士（George Candidius, 1597-1647）的〈福爾摩沙地理與歷史短論〉。<sup>52</sup> 本節的焦點將放在Barlow所繪製的一幅福爾摩沙地圖。這份地圖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科學探查成果，而更應被理解為具有旅行書寫意義的資料。

Barlow擅於繪畫且相當多產。在其日記中共收錄了4幅全彩圖，另有約50幅半色調（half-tones）圖繪。這些作品並不一定是完整的全版面圖像，許多時候僅是隨筆畫於版面邊緣。在福爾摩沙期間，Barlow收集了不少資訊，雖然零散且不夠全面，但仍為後世留下相對清晰的圖像。其中一幅關於臺灣的畫作（參見圖1），尤能展現他的觀察。此圖並未留下標題，但如前所述，Barlow並非依照經緯度或實際測量來繪製地理空間，更像是以個人觀察與感受為基礎的作品。本節將透過對此圖的分析，嘗試瞭解Barlow在臺灣的經歷與觀察，並依序從澎湖、臺灣的地形與地貌談起，再延伸至船隻等細節。

Barlow於1671年接下航行任務，並於9月27日啟程。此次航行由3艘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隻執行，包括Zant號前往東京（Tongking）、返程號（Return）前往Ffermosa（原文如此，以下照此拼寫）、實驗號（Experiment）則前往日本。後兩者的主要任務在於前往福爾摩沙和日本，並在船上派有商務員，期望能在兩地設立商館；Barlow則在旗艦實驗號上服務。<sup>53</sup>

<sup>52</sup> 簡宏逸，〈追蹤甘治士：重建近代初期歐洲臺灣研究系譜〉，《文史臺灣學報》，第16期（2022年9月），頁1-27。

<sup>53</sup> Basil Lubbock, *Barlow's Journal of His Life at Sea in King's Ships, East & West Indianmen & Other Merchantmen from 1659 to 1703* (London: Hurst & Blackett, LTD, 1934), pp. 204-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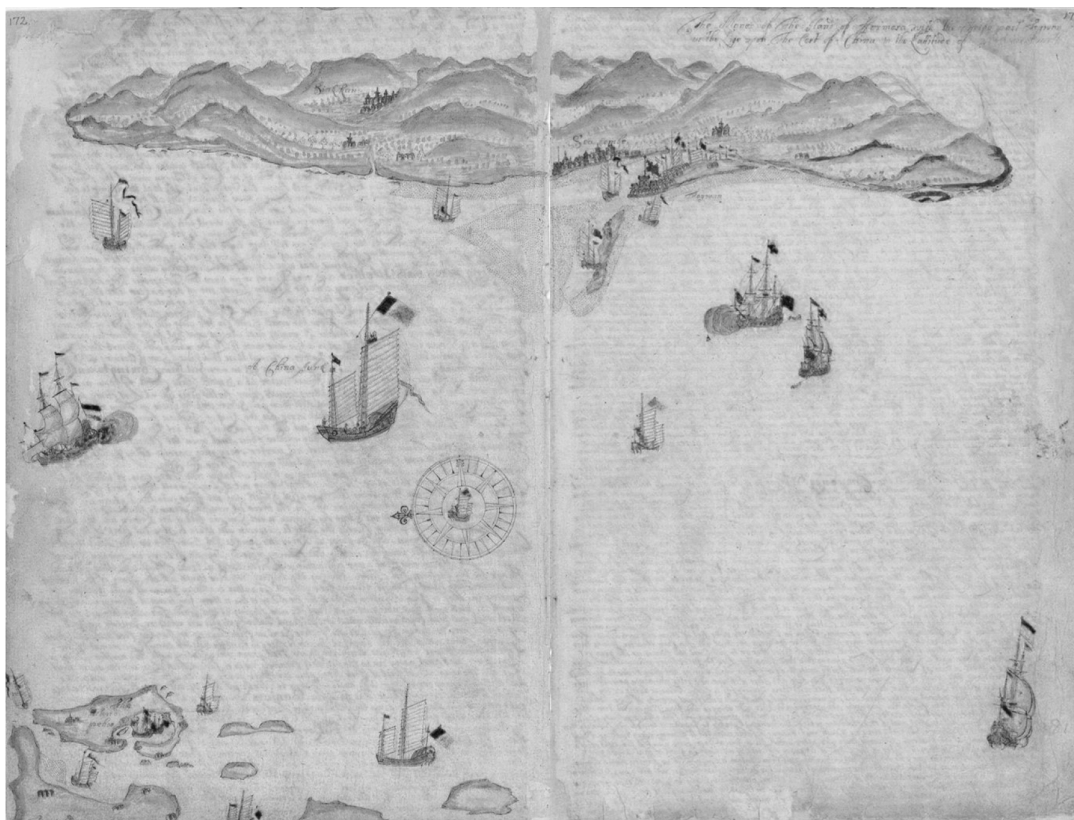


圖1、Edward Barlow繪製Toywan、Pehoo、Piskedores、Ffermosa地圖

資料來源：Caird Library and Archive, Royal Museums Greenwich.

在構圖上，他將北方置於左側，「臺灣島」——即他圖中及日記中所稱的Toywan與Ffermosa——位於地圖的上方；另外幾座小島位於左下方，對應Pehoo和Piskedores，即「澎湖群島」。澎湖與臺灣之間的水道上，散布著一些船隻。此圖所涵蓋的「空間」，主要是Barlow在親臨福爾摩沙時實際移動、接觸與停泊的區域，但並非完全精確，仍有部分區域是他在日記正文中未註明或未提及的，例如新港所在的位置。

在Barlow的其他圖像中，他往往會因地制宜地設計標示方位的羅盤。在圖畫中央，羅盤通常以船隻作為象徵，呈現異域文化的核心。例如，在其原件第4頁的圖中，中央是一艘英國船隻；而在萬丹（Bantan）港口的繪製中，羅盤中心則是

一艘阿拉伯式船隻。<sup>54</sup>

這幅臺灣地圖的左下角散布著幾座島嶼，其中一處帶有港灣的島嶼標註為「澎湖」(the Island Pehoo)，該港灣應指媽宮港，島上的聚落則以紅色房屋標示。與澎湖島相隔西側的另一處較大島嶼，標註為「漁翁群島」(the Piskedores Islands)，上方同樣分布數個聚落。換言之，對Barlow來說，澎湖和漁翁群島分屬兩個不同的地理位置。

若細究地形和幾處島嶼位置，在媽宮灣澳中間畫有一座小島，應指灣中的案山。在澎湖與漁翁群島之間，Barlow以形同臺江內海的沙汕筆法描繪一處沙汕。澎湖地區沙汕有限，據《澎湖廳志》所載：「經吼門而土地嶼、鐵砧嶼轉而東北，直至北境，為澎山發源、龍脈渡海之處，有沙汕一條，極長，伏於水中，尤稱險絕。」<sup>55</sup> 此沙汕或即今日從白沙一帶通向吉貝等北方島嶼的沙汕。不過，根據地理空間和方位標示，Barlow地圖上所畫的沙汕似乎又與白沙等地不同；加之Barlow並未前往白沙等地，多數時間停留於媽宮港一帶，因此另一個可能性是吼門水道。吼門水道位於西嶼（即圖中的漁翁群島）北端，資料記載：「吼門水淺，其時蓋漲三尺云。」另外附近的師公礁：「附近吼門有石潛伏水底，舟不敢犯。」<sup>56</sup> 而鄰近的西嶼牛心礁嶼處：「嶼下有礁，如牛心形，故名。」<sup>57</sup> 這些地點在方位上與圖中象徵沙汕的位置略為接近。

雖然不是每一座小島都能觀察或精確定位，例如在風櫃尾外的兩處小島，依相對位置判斷應是雞籠嶼和桶盤嶼；較為明確可辨的則是在澎湖南側一處狀如「凹」字型的島嶼，為以山形水勢圖技法繪出的虎井嶼。虎井嶼在蔣毓英《臺灣府志》中稱為「穴嶼」，形狀「形如猛虎，中裂一港，故名。」<sup>58</sup> 鄭維中的文章

<sup>54</sup> 可參見“Journal of Edward Barlow, 1666-1675,” Royal Museums Greenwich藏，入藏檔案號：JOD/4/1-98；萬丹圖中另外還有從海面上觀察陸地上的山形水勢圖之描繪；參見Basil Lubbock, *Barlow's Journal of His Life at Sea in King's Ships, East & West Indianmen & Other Merchantmen from 1659 to 1703*, pp. 210-211.

<sup>55</sup> 林豪，《澎湖廳志》，第1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年），頁29。

<sup>56</sup> 林豪，《澎湖廳志》，第1卷，頁13。

<sup>57</sup> 蔣毓英，《臺灣府志》，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58。

<sup>58</sup> 蔣毓英，《臺灣府志》，第3卷，頁56。

亦精確提及，1664年荷蘭船艦自媽宮出航後向東吉嶼南微西前進，穿越虎井和澎湖之間航道前往臺灣本島。<sup>59</sup> 換言之，Barlow很可能是在澎湖與臺灣之間往返時，親眼觀察到當地地形，並憑藉其繪製山形水勢圖的經驗將該處標示於圖中。

實際上，如前所述，Barlow的日記中包含超過50幅各種圖畫作為插圖。翻閱這份日記後，首先印入眼簾的是好幾頁沿著泰晤士河通往海口的橫向倫敦圖。如果將這些圖像連接起來，將會呈現出類似長軸式的畫法。這些圖像中，除了河流上的船隻外，空白處還補上了以山形水勢圖技法繪製的周圍山脈、入海口與停泊地等；雖然這些畫法未必精確，但卻體現了他本人的繪圖手法和習慣。<sup>60</sup>

類似的構圖方式也是Barlow的主要畫法。例如在臺灣島上，他以南北橫跨整幅圖，但紅屋象徵的聚落主要集中於島中央。Barlow在本島上標示了「Toywan」，並在右上角空白處寫著：「The Manex [main] Of the island of Ffermosa and The Chief island Is Toywan as the lige [league] upon the cost [coast] of China in the latitude of 23……」，雖然拼字和缺漏字略有影響，但仍可大致看出這段文字在描述Ffermosa島、Toywan島與中國沿岸的相對及絕對位置。

Toywan島上的聚落最為密集，本島標示的地名的聚落包括S'canbombe（赤崁）和Sinkkan（新港）二處，而新港前還有一處明顯的河口，河口南北岸亦各有一處聚落。沿海部分，除了較易辨識的小琉球位置外，小琉球以南還有幾處類似沿海島礁的符號，Sinkkan前河口以北也亦有一些島礁符號，但無法確定它們分別代表哪一座島嶼。

<sup>59</sup> 鄭維中，〈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在臺灣周邊海域的水文調查活動（1636-1668）〉，《人文社會及社會科學集刊》，第33卷第1期（2021年3月），頁70。有關澎湖前往臺灣的航線，陳宗仁依據中文文獻已有詳盡全面的研究，可參見陳宗仁，〈十六、十七世紀針路簿的澎湖航線分析〉，收入張美惠總編輯，《2021澎湖學第21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馬公：澎湖縣文化局，2021年），頁187-206。

<sup>60</sup> 可參見“Journal of Edward Barlow, 1666-1675,” Royal Museums Greenwich藏，入藏檔案號：JOD/4/1-98。

Barlow畫作中的新港，是鄭氏時期天興縣（後改為天興州）治的所在，亦屬當時的行政核心之一。<sup>61</sup>除了此處的臺江內海之外，從該河口以南至小琉球島一帶，畫中還標示為「沙汕」，這些指稱不僅涵蓋臺江內海，應當也包含了蟻港內海。換言之，對Barlow而言，新港就是臺江內海最北端的溪流，或許正是荷蘭地圖上常標示的「剖人溪」（Verraders of Moordenaars Rivier）。<sup>62</sup>至於臺江內海部分，除有熱蘭遮城所在的七鯤鯓外，對岸的北線尾亦在其內；而在北線尾北側、鹿耳門水道旁另有一大片沙汕，應即為清代所稱的「海翁線」一帶。

鄭氏時期以安平和赤崁為核心聚落，<sup>63</sup>在安平的位置上，Barlow畫出了一座城堡，其上懸掛一面大纛，圖案近似鳳凰。中軍大纛在明代軍禮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設有旗纛廟以供祭祀，因此至少可以確定，此類高懸大旗具有顯著的象徵性與權威性。<sup>64</sup>據《臺灣外記》記載，當時若在陸地上遠望鄭家船隻，往往會見到「有巨艦數十號，悉係我們的旗幟，揚帆而來。」由此可推測，當時海上除了常見的航海旗幟外，還存在鄭氏專屬的旌旗。<sup>65</sup>鄭成功率軍攻打臺灣時，即曾「成功坐駕豎起帥旗，旁列五方，中懸龍纛。」<sup>66</sup>又三藩之亂時，鄭軍包圍漳州城，成功勸誘吳淑等人策反，當時所頒授的憑證除了印信、笏付、旗幟之外，還包括一面「金龍黃纛」。<sup>67</sup>由此可見，無論鄭成功或鄭經，「龍纛」似乎都是鄭家的主旗。然而，考量到Barlow筆下旗幟上的紅色圖騰，也可能與明代軍旗制度有關。例如戚繼光《紀效新書》中就載有一幅軍旗，題曰：「南方丹陵三炁丙

<sup>61</sup>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輿地彙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年），頁42。此區域即是陳宗仁依據Selden Map所指出17世紀臺灣西南海域，也是東亞、西方人對於此處可以停泊船隻區域的主要區塊。參見陳宗仁，《Selden Map與東西洋唐人：地理知識與世界景象的探索（1500-1620）》（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2年），頁179-223。

<sup>62</sup> 可參見Pieter Janszoon van Middelburch, "Map of the Western Coast of Taiwan, Tayouan and Points North, c. 1636," Austrian National Library藏, Atlas Van der Hem, V. XLI, sheet 4-2.

<sup>63</sup> 楊英，《從征實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189。

<sup>64</sup> 郭紅，〈明代的旗纛之祭：中國古代軍事性祭祀的高峰〉，《民俗研究》，2013年第5期（2013年9月），頁90-96。

<sup>65</sup> 江日昇，《臺灣外記》，第8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頁372。

<sup>66</sup> 江日昇，《臺灣外記》，第5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頁194。

<sup>67</sup> 江日昇，《臺灣外記》，第7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頁297。

丁巳午火，其神朱雀，其色紅」；<sup>68</sup> 又如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明人畫出警圖》中，亦見白、藍、紅等色旗幟，圖案則有白虎、青龍、朱雀等。<sup>69</sup> 由此推測，Barlow所繪的紅色大纛，或許正是鄭氏軍旗中「朱雀旗」，或與「龍纛」並行使用。

除了山形水勢技法、島嶼、沙汕與聚落等地圖元素外，Barlow的圖上還繪有大量船隻：其中懸掛荷蘭旗的船隻共有2艘、英國船隻4艘；另有懸掛紅藍旗幟的中式帆船（China junk）6艘，以及僅懸掛紅旗的至少8艘。部分因畫作中呈現停泊於港灣、彼此重疊的狀態，難以精確統計數量（參見圖2）。這些船隻的位置並非隨意安置，而具有明確意涵。例如，在海翁線鄰近臺灣本島處、鹿耳門口、大員水道等地皆出現中式帆船，顯示這些區域即為可通航的水道。圖中的中式船隻均為雙桅船。雖然清廷自順治年間起禁止建造雙桅船，但沿海居民仍常接受鄭氏委託協助打造，因此雙桅船亦成為鄭軍的主要艦種。<sup>70</sup>

這些中式帆船所懸掛的旗幟大致可分為三類：紅白相間、白底帶3個紅點；不懸掛任何旗幟；以及紅藍對比旗幟。旗製的主要功能在於醒目辨識。正如《明季南略》記載鄭成功攻打鎮江時，「旗幟五色，紛耀奪目」。<sup>71</sup> 又如康熙17年清軍在福建作戰時，因綠營旗幟在林中難以辨識，遂建議加上「紅紬鑲邊，心用紅日」，並在「各將領旗幟之中繪畫飛虎，以壯軍容」。<sup>72</sup> 同樣地，在鄭成功攻鎮江之戰中，陸軍先鋒部隊所用為五色旗，而次部隊則使用蜈蚣旗。<sup>73</sup>

雖然文字資料中難以找到更多有關旗幟的細節，但若配合同時期其他在東亞海域航行的中式帆船圖像，仍可進行一些有趣的比較。日本繪製的各種唐船圖

<sup>68</sup> 戚繼光，《紀效新書》，第16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2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5。

<sup>69</sup> 〈明人畫出警圖〉，收錄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精選」：<https://theme.npm.edu.tw/selection/Article.aspx?sNo=04001151>（2025/4/1點閱）。

<sup>70</sup>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己編》，第3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9年），頁249-250。

<sup>71</sup> 計六奇，《明季南略》，第11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頁334。

<sup>72</sup> 楊捷，《平閩紀》，第2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頁36-37。

<sup>73</sup> 計六奇，《明季南略》，第11卷，頁3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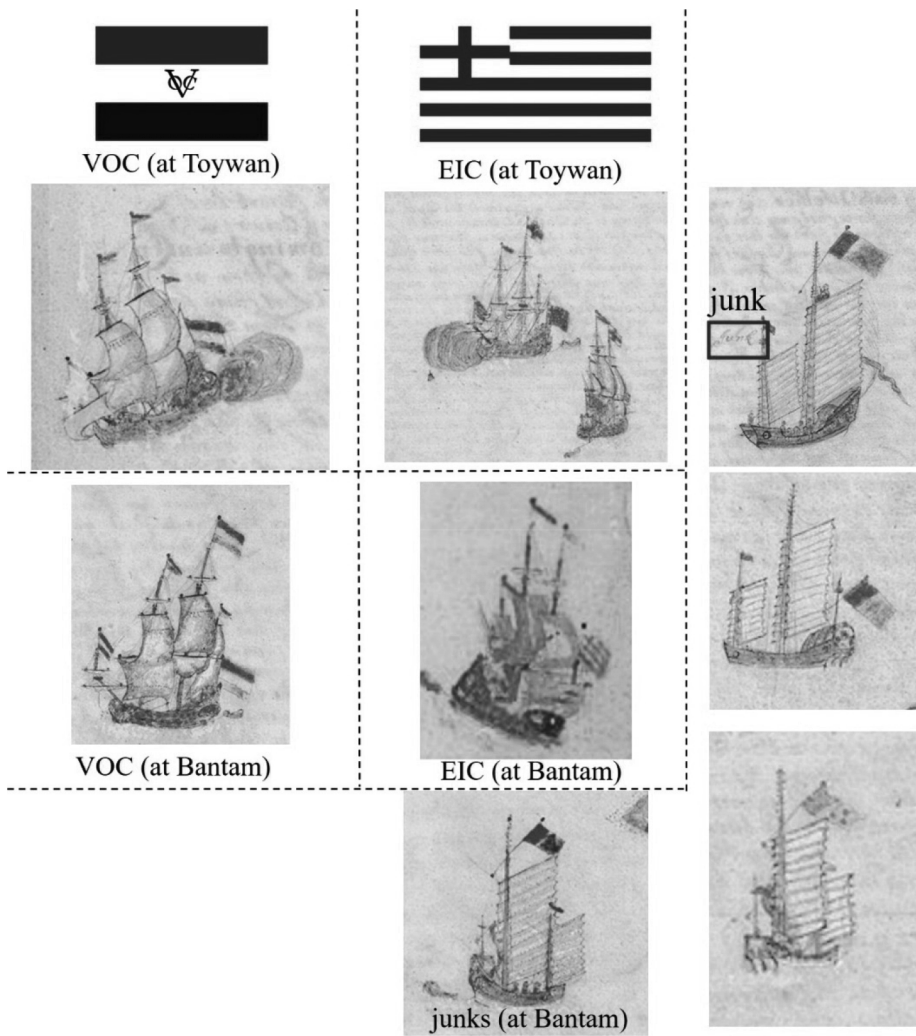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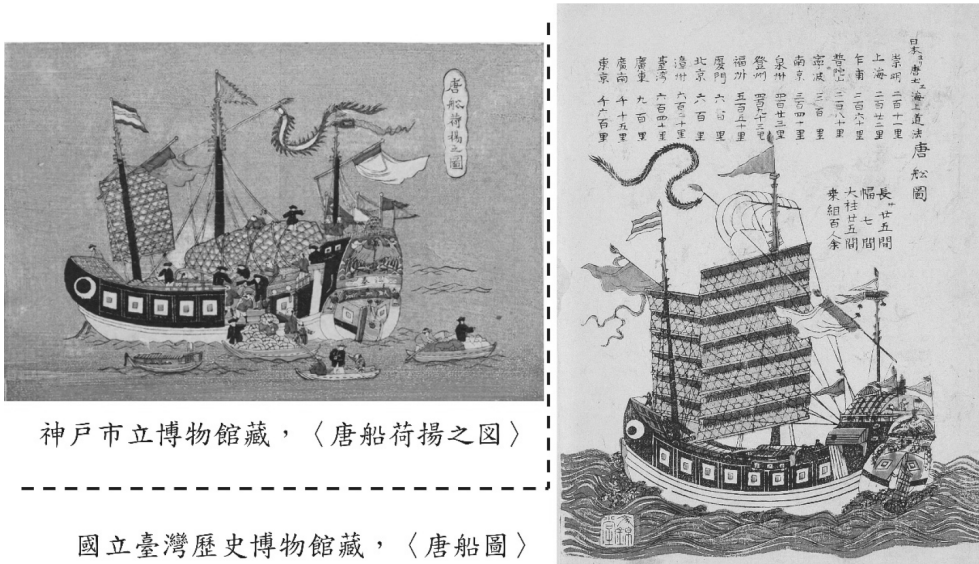


圖2、Barlow地圖中船隻分類

資料來源：筆者擷取整理自圖1。

中，就保存了不少細節可供參照（參見圖3）。例如在〈唐船荷揚之圖〉與〈唐船圖〉中，可以看到藍、紅、白等色的方形旗幟，這些都是唐船上常見的重要標示，正好呼應了Barlow在海上所觀察到的現象。另一方面，Barlow圖中有幾艘未懸掛紅藍方旗的中式帆船，但仍插有長條狀或三角狀的紅色、藍色旗幟，與日本所繪唐船的樣式大致相符。換言之，透過Barlow的現場觀察與圖繪，我們大致能





神戶市立博物館藏，〈唐船荷揚之圖〉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唐船圖〉

### 圖3、各種唐船圖繪

資料來源：兩幅圖分別取自〈唐船荷揚之〉，收錄於「文化遺 ンライン」：<https://bunka.nii.ac.jp/heritages/detail/441946>（2025/3/19點閱）；〈長崎繪〈唐船圖〉〉，收錄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NMTH COLLECTIONS」，<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4.020.0067>（2025/3/19點閱）。

窺見17世紀中後期東亞海域上中式船隻的各種型態。

此外，在Barlow的圖繪中，所有中式帆船之中，位於圖中中央偏左的一艘船特別引人注目，因其相較於其他船隻增添了許多細節。除了船首繪有魚眼之外，船上還可見數名水手正在作業；最有趣且最顯眼之處，是在該船桅桿的頂端，還有一個人影。根據記載，明清時期的海舶中，船主被稱為「出海」，而船上另有「亞班」一職：「用以緣桅攀帆，捷如猿猱，升頂了無怖畏，足資占望經理者」。<sup>74</sup> 所謂亞班，即負責司桅之人，又稱「斗手」。<sup>75</sup> 另有記載，在橫渡臺灣海峽時，有如此描述：

<sup>74</sup> 朱景英，《海東札記》，第2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15-16。

<sup>75</sup> 周凱，《廈門志》，第15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頁645。

黑水小溝仍屬臺灣。黑水大溝則臺灣與內地分界處也。闊約七、八十里，視之水黑如墨。以桶汲起，仍清水也。小溝深險絕倫，船難寄碇。大溝水亦如墨，深約四、五十丈。南流急時，風靜波恬，猶堪寄碇。其流湍急，冠絕諸海。船利乘風疾行，亂流而渡；遲則波濤衝擊，恐失針路。大溝既過，再行二更，則令亞班登桅遙望，以認內地山影，方知船之高低。<sup>76</sup>

又有一詩云：「出海與亞班，神色俱蒼皇；飛身上桅杪，指南憑針芒。」<sup>77</sup>類似的描述甚多，如「若島嶼可望，令望白者（曰亞班）登桅遠望」。<sup>78</sup>甚至清代水師的考核評比中，也將「爬桅泅水」列為一項指標。<sup>79</sup>因此，繪於船桅上的那名人物，當是一位亞班無疑。當Barlow航抵東南亞時，他遇見來自中國的商船，並認為其建造方式有別於歐洲船隻，而且設計精巧，適合長途航行。<sup>80</sup>

雖然實際抵達臺灣的英國船隻僅有「返程號」和「實驗號」2艘，但在圖中卻共繪有4艘。其中2艘停泊於媽宮港內，另2艘則位於大員外海，且清楚描繪出拖曳小船的情景，其中1艘更繪有開砲、硝煙繚繞的樣子。拖曳小船的情景可與日記中的描述相互映證，而砲擊場景則可能反映了當時歐洲繪圖的習慣。此圖中的4艘船隻實際上係將英船抵達臺灣與停泊澎湖兩個時期的情境疊合在一起。至於媽宮港內的2艘英船，則正好反映出鄭氏時期的交通方式：「今之往來船隻，必認澎湖為關津，從西嶼頭入，或寄泊峙內或媽宮澳，然後渡甘吉洋，凡四更船至臺灣。」<sup>81</sup> Barlow在臺灣停留期間並未親眼見到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隻，但他仍繪出2艘懸掛荷蘭旗的船隻，其中位於圖左側者同樣描繪有開砲與硝煙。這或許源於他在澎湖時曾聽聞有1艘荷蘭船於臺灣海峽遭遇風難而沉沒。由此可見，Barlow筆

<sup>76</sup> 周璽，《彰化縣志》，第1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頁22-23。

<sup>77</sup> 蔣鏞，《澎湖續編》，下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頁95。

<sup>78</sup> 林豪，《澎湖廳志》，第1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年），頁31。

<sup>79</sup>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己編》，第7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9年），頁694。

<sup>80</sup> Basil Lubbock, *Barlow's Journal of His Life at Sea in King's Ships, East & West Indianmen & Other Merchantmen from 1659 to 1703*, p. 212.

<sup>81</sup> 蔣毓英，《臺灣府志》，第3卷，頁40。

下的2艘荷蘭船並非真實再現，而是結合聽聞與想像的再構。

自17世紀末以來，英國地圖逐漸呈現出鮮明的跨文化（cross-cultural cartography）特色，將英格蘭在世界各地接觸、碰撞所得的新事物揉雜並鑲嵌於地圖之中，呈現出多元的樣貌。<sup>82</sup> 正如前文所述，即便英國在18世紀隨著擴張而成為歐洲地圖繪製與出版的領先者之一，但在17世紀時，荷蘭人的地圖無論在象徵、地名或地理規範上，都完全壓過英國，占據主導地位。這也使得英國深感苦惱，並嘗試在這場競爭中尋求勝利，只是這個勝利可能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實現。<sup>83</sup> 通過學者對商人Augustine Herman在北美德拉瓦河與馬里蘭地區所繪製的地圖之分析亦指出，在帝國殖民邊緣地帶的人群，其經驗基本上符合帝國的發展，甚至可以說他們本身就是帝國的化身。換言之，17至18世紀的帝國願景，正是透過這些遠離核心的個人之作品——無論是畫作或地圖——而具體呈現。<sup>84</sup> 因此，在這一時期，這些個人（individual），無論是商人或水手，皆可被視為帝國的代名詞，他們在邊緣地帶實際操作著「帝國」。不過，這些討論中的地圖往往意指帶有經緯度標示、「精確」的海圖；相較之下，Barlow隨筆式的繪圖則更傾向於一種基於視覺觀察的再現。

總之，Barlow的這幅臺灣圖繪中，結合了想像與親身觀察。他的觀察不同於同時代歐洲地圖所著重的水深、貿易、物種或緯度等科學化調查資料，也有別於大清《臺灣略圖》那類以標示軍事部署為主的示意圖。Barlow所繪製的，是他親炙現場後所感知的空間：航行中所見的島嶼形狀、中國船隻的特色與水手身影、沙汕礁石的位置與分布等，體現的不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為航行與科學所需的視角，而是他作為個人的觀察與認識。即便圖中包含相對寫實的虎井、臺灣山勢、

---

<sup>82</sup> Benjamin Schmidt, "Collecting Global Icons: The Case of the Exotic Parasol," in Daniela Bleichmar and Peter C. Mancall edit, *Collecting Across Cultures: Material Exchanges in the Early Modern Atlantic Worl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 pp. 31-32.

<sup>83</sup> Benjamin Schmidt, "Mapping an Empire: Cartographic and Colonial Rivalry in Seventeenth-Century Dutch and English North America,"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54: 3 (July 1997), pp. 549-578.

<sup>84</sup> Christian J. Koot, "The Merchant, the Map, and Empire: Augustine Herrman's Chesapeake and Interimperial Trade, 1644-73,"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67: 4 (October 2010), pp. 603-644.

沙汕、攀爬船桅的亞班與旗幟等細節，仍同時加入了帶有想像的成分——例如那些實際上並不存在或他從未親見過的荷蘭船隻。

## 肆、文字記載中的「福爾摩沙暨大員王國」

除了圖繪之外，Barlow還留下了文字紀錄，使我們能夠在圖像之外，進一步瞭解他對於臺灣——當時被稱為「福爾摩沙暨大員王國」——的認識，也使整趟旅程的旅行書寫更加完整。他具備完整書寫能力，是在1672年被俘虜於巴達維亞時才學會的；換言之，有關他在臺灣的相關紀錄，應有不少是他在掌握書寫能力之後，以回顧方式補述的。<sup>85</sup> 本節將把日記中的描述視作一種異域旅行文本，並嘗試梳理他的旅程、紀錄與觀察。

1671年，雖然上一趟旅程中部分同僚已不願再踏上充滿不確定性的東方航程，但Barlow認為這將是一個有利可圖的航行，因為：

如果我攜帶一點小投資的貨物，說不定可以賺點小錢；我也想看看是否有可能在我年紀還不大之前，先賺點錢，之後也許可以改行去做其他工作，離開海上生活，因為到老了還在海上漂泊實在辛苦。這種職業充滿了災難與磨難、危險與痛苦；如果我能完成這趟航程，那麼這會對我大有好處。<sup>86</sup>

更重要的原因在於，相較於這次航程中同樣會前往的日本，Barlow自述：

同時，我也對這次旅程本身抱持興趣，因為我們將前往一個40年來沒有英國人登陸過的地方，那就是中國沿海的「福爾摩沙（Ffermosa）」島。<sup>87</sup>

<sup>85</sup> Beverly Lemire, ““Men of the World:” British Mariners, Consumer Practice,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an Era of Global Trade, c. 1660-1800,”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54:2 (April 2015), p. 299.

<sup>86</sup> Basil Lubbock, *Barlow's Journal of His Life at Sea in King's Ships, East & West Indianmen & Other Merchantmen from 1659 to 1703*, p. 204.

<sup>87</sup> Basil Lubbock, *Barlow's Journal of His Life at Sea in King's Ships, East & West Indianmen &*

也就是說，這兩個因素符合當時英國的社會局勢，例如商業社會和科學影響，讓Barlow的這趟旅程除了能賺取金錢外，也將前往此前從無英國人涉足的福爾摩沙。這種潛在的異域經驗，很可能驅使著他前往的慾望。

在1671年登上旗艦「實驗號」服務前，他對臺灣的地理認知是：大員（Toywan）位於Ffermosa沿岸，而Ffermosa則位於中國（China）沿岸。船隊裝載了各類寬布、鉛、硃砂、明礬等作為前往東方的主要貨物，並於1671年9月27日從英國泰晤士河口的格雷夫森德（Gravesend）待命出發，比另一艘同型船「返程號」晚了一週，並於大約10月1日從唐斯（Downs）正式啟航。此次任務共有3艘船，除了目標是福爾摩沙和日本的旗艦「實驗號」以及「返程號」外，還有目標是東京灣的「Zant號」。離開倫敦後，船隊先向西南航行，最終停留在聖地牙哥島，經過約12週的航程後，於1672年2月2日繞過好望角，順風向東南前進，途中遇到了提前出發的「返程號」。在南緯30度左右，船隊趁著西風前行，但因惡劣氣候，數名船員喪生或落水。最終，船隊順利望見爪哇島，穿越巽他海峽，抵達萬丹。<sup>88</sup>

在爪哇和萬丹一帶，Barlow同樣對地理、物種等進行了類似博物學的觀察。除了前述鄭維中曾提及他記錄的魚種外，還包括例如Barlow註明當地的小型獨木舟稱為Prow，以及當地的經緯度位置，和各種可接觸到的水果，如柑橘、椰子、香蕉、柚子等。他同時也記錄了當地人的習性、穿著打扮、各種動物，以及英國在該處的貿易活動與歷史。當兩艘船在此為配合風向啟程前往臺灣和日本時，船員迅速準備各種貨物，包括胡椒、印花棉布、染料木等。不過，來自英國的Barlow雖然欣喜於此處的一切，卻也在此感染了熱帶疾病。整個船隊在這裡休整了1個月後，再次啟程前往Toywan完成任務。<sup>89</sup>基本上，Barlow在爪哇和萬丹的觀察重點，也成為他隨後在臺灣觀察的基礎。

---

*Other Merchantmen from 1659 to 1703*, p. 204.

<sup>88</sup> Basil Lubbock, *Barlow's Journal of His Life at Sea in King's Ships, East & West Indianmen & Other Merchantmen from 1659 to 1703*, pp. 204-206.

<sup>89</sup> Basil Lubbock, *Barlow's Journal of His Life at Sea in King's Ships, East & West Indianmen & Other Merchantmen from 1659 to 1703*, pp. 207-212.

在前往Toywan的途中，原先要派往日本商館的商務員去世，因此立即改派返程號上原本要前往Toywan的商務員前往日本。這反映出英國東印度公司當時對日本貿易的重視程度高於臺灣。船隊航行經過一處稱為「島嶼岩」（Island of Rocks）的地方，這些地方原本被認為是可居住的島嶼，但此時僅有部分露出海面。該區域另有少數露出水面的岩石，被稱為「帕西利斯」（Persiles或Paracels）。船隊繼續向東北航行，途中遇到1艘可能來自中國的舢板，兩天後又經過Anyam島，再過兩、三天後船隊靠近澳門。隨後，他們繼續向東北前進前往Ffermosa。即便當時遷界令正在實施，航行途中仍遇到不少船隻擦肩而過；由於一直能肉眼看到「mainland of China」，顯示船隊應該距離海岸不遠。最終，在離開萬丹5週後，航行約800里格，抵達「大員」城堡（Castle of “Toywan”，原文在Toywan加上引號）附近下錨。此時，「大員」國王（King of “Toywan”）派出小船前來查看並登上返程號。實驗號和返程號上均搭載了幾名在萬丹上船的Chinamen，其中幾名登上小船登岸——這些很可能就是圖繪中放下小船的英國船隻。<sup>90</sup> Barlow抵達福爾摩沙後的印象之一是：「這裡的居民與我們過去見過的亞洲人不同，他們的服飾與生活方式獨具特色。」他並認為：「福爾摩沙的環境相對宜人，比爪哇等地的氣候更適合居住。」<sup>91</sup>

英國船隊被允許在城鎮（town）外的2里格處下錨停泊——而非靠近城堡，原因是港灣（harbour）內多為沙洲，唯有小船能夠停靠——也就是圖畫中所繪的英國船隻，下錨在外海及臺江內海。次日，一群由國王派來的人登船，告知船上人員，岸上已備妥居住處與伙食。隔日，他們登上一艘隨英國船隻從萬丹前來的中式帆船（junk），接受國王侍衛（King’s Guard）的款待，被引上岸居住，據說雙方也在岸上談妥了貿易合作事宜。不過，Barlow等人仍留在2艘船上，停泊在相對危險的水域，他自稱食物待遇相當不錯，而水手們則被告知不久後將前往日本。Barlow描述當時風向不佳，且返程號遺失了一個船錨。隨後，兩名領航員被派上船，準備先前往漁翁群島（Piskedores）以策安全。雖然被告知大約需5到6日

<sup>90</sup> Basil Lubbock, *Barlow’s Journal of His Life at Sea in King’s Ships, East & West Indianmen & Other Merchantmen from 1659 to 1703*, pp. 214-216.

<sup>91</sup> Basil Lubbock, *Barlow’s Journal of His Life at Sea in King’s Ships, East & West Indianmen & Other Merchantmen from 1659 to 1703*, pp. 222-223.

才能抵達，他們仍頂著Barlow從未見過的強大海流，以每4小時20哩的速度離開Toywan前往該地。

雖然不清楚航程花費了多久，他們最終抵達了一處被陸地環繞的區域，測得水深約10英呎，顯示他們已開始進行科學化的水文調查。Barlow稱此地為澎湖（Pehow），並描述：「發現自己身處一個安全的港口，四周皆被陸地包圍，水面平靜」。在此等待了14或15天後，終於有4、5艘中式帆船攜帶貨物前來貿易，水手們把貨物和英國東印度公司欲送給大員國王的禮物運上船隻。不過，或許因為這段時間的等待和協商，他們已錯過了適航的風期。原先曾規劃是否要在澎湖過冬，但考量費用不菲，最終決定返程號回萬丹等待下一步指令，而其他的中國帆船（junk）和船隻則前往Toywan，準備隔年再赴日本。然而，此時在澎湖的一處狹窄水道上，遇到一場稱為突發陣風（原文為Peire soxme，不過該是paroxysm）的間歇性風暴，該風暴可持續4到5個月，並在東北季風期間最為劇烈。<sup>92</sup>

雖然不確定Barlow所稱的護衛（guard）是否即是指鄭氏的「侍衛」，但至少鄭經與鄭襲相爭時，鄭經已任命馮澄世之子馮錫範擔任侍衛。<sup>93</sup>到了康熙8（1669）年，馮錫範仍掌此職。<sup>94</sup>1672年，有攻打呂宋的議論時，出面阻止的正

---

<sup>92</sup> Basil Lubbock, *Barlow's Journal of His Life at Sea in King's Ships, East & West Indianmen & Other Merchantmen from 1659 to 1703*, pp. 216-217. 同樣與Barlow一樣造訪澎湖的Dampier，也均在船上並未下船；Dampier則是著重港口的描寫，他稱二座東端島（Eastermost Islands）有著非常良好的港口，從來沒有中式帆船在該港缺席。二座島中的西側島嶼是一個大城鎮並且擁有軍事堡壘，該城鎮的房屋雖不高，卻相當漂亮，目前則是有三到四百人的「韃靼駐軍」（當指該處綠營），他們將會在此駐紮3年後移轉到其他地區。此島的港口西側靠近海的地區，有一座漢人（Chinese）的小鎮。若說軍事堡壘駐紮有軍隊，該是指媽宮澳，鄰近的金龜頭：「有小城，名新城；二門，規制甚狹，周圍不及一里。無居民，惟營兵輪翻戍守，亦無常宅其內者。城南臨海，置砲位，蓋以備守禦也。」參見William Dampier, *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 417；杜臻，《澎湖臺灣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頁29。

<sup>93</sup> 夏琳，《閩海紀要》，上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30。

<sup>94</sup>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第2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44。

是馮錫範。<sup>95</sup> 當1666年呂宋遣使來臺灣時，負責接待的是「賓客司」，<sup>96</sup> 該司主要負責「晉接聘問」，而馮錫範擔任的侍衛則負責親軍。<sup>97</sup> 雖然因史料有限，管理鄭家對外貿易事務的或許是賓客司，但馮錫範直到鄭氏滅亡前夕，仍是政權中最重要的權臣之一，因此他很可能就是接待英國人的官員。

此後，Barlow未前往Toywan，而是被要求先前往媽宮暫居。他描述澎湖並無特產，僅有適合放牧的牧草和一些根莖類作物，島上缺乏樹木與灌木，但漁業資源相對豐富。<sup>98</sup> 雖然《澎湖廳志》記載：「海濱斥鹵，土性磽瘠，泉源不淪，雨露鮮滋，地之所產微矣。」<sup>99</sup> 然而，十幾年後抵達此處的Dampier則稱，澎湖雖僅有短草與稀疏樹叢，卻有豐富的羊群和一些牛群。他還描述了該地的山丘，以及一些老舊但不再使用的防禦設施。<sup>100</sup>

與此同時，Barlow透過傳遞和交換消息的方式，開始描寫尚未親身到訪的Toywan地形。他指出，要前往Toywan必須通過一條相當狹窄的水道，並獲悉1艘荷蘭商船Holanes在前往日本途中遭遇風暴漂流至北Ffermosa，最終被當地島民（island people）殺害。等一切準備就緒後，Barlow所在的實驗號起錨前往Toywan載運貨物，並將返程號留在澎湖。Barlow本人則朝南南東方向前往Toywan，並且在城堡（castle）旁的灣澳下錨停靠。<sup>101</sup>

<sup>95</sup> 江日昇，《臺灣外記》，第6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頁259。

<sup>96</sup> 不著撰人，《閩海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後紀略，頁30。

<sup>97</sup> 江日昇，《臺灣外記》，第6卷，頁237。

<sup>98</sup> Basil Lubbock, *Barlow's Journal of His Life at Sea in King's Ships, East & West Indianmen & Other Merchantmen from 1659 to 1703*, p. 218.

<sup>99</sup> 林豪，《澎湖廳志》，第10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年），頁331。

<sup>100</sup> William Dampier, *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 416. 這些該是當年劉國軒整備軍隊時所留下，正如施琅攻打澎湖時觀察到：「將娘媽宮嶼頭上下添築砲城二座，風櫃尾砲城一座，四角山砲城一座，雞籠山砲城一座，東西嶼內一列砲臺四座，西面內外塹西嶼頭一列砲臺四座，牛心灣山頭頂砲臺一座。凡沿海之處，小船可以登岸者，盡行築造短牆，安置腰銃，環繞二十餘里。」參見施琅，《靖海紀事》，上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27。

<sup>101</sup> Basil Lubbock, *Barlow's Journal of His Life at Sea in King's Ships, East & West Indianmen & Other Merchantmen from 1659 to 1703*, pp. 217-219.

兩天後，包括100箱銅、明礬、茶葉、中藥材（China roots）等幾批貨物陸續被送上船。換言之，Barlow暫時未下船，一直待在Toywan港灣內。Barlow提到，在Toywan可以購買到日本黃金，而且獲利相當不錯。他也表示，「我們」與當地人展開貿易，中國人可以將商品帶到實驗號上出售，包括茶葉、中藥材、精美瓷器以及織錦絲綢。他認為這些貨品價格適中，帶回英國應能成為不錯的商品。不過，他也抱怨英國東印度公司管理嚴格，認為只有公司本身才能經營貿易，因此不允許任何船上人員購買與公司相同類型的貨物，以避免競爭。若有人在航行途中購買重複貨物被發現，返回英國後就必須按進貨價格支付相同金額；若購買數量過多，還可能被扣除工資，且這些都需要簽署文件以茲證明。

Barlow同時發現，Toywan的日本黃金價格相當便宜，可用22至24西班牙銀幣購買一個copang（即小判（こばん），江戶時期金幣），相當於在英格蘭需花費40英鎊。他也指出，英國商品在Toywan與Ffermosa幾乎不受歡迎，除了少量紅布（scarlet）與紅珊瑚外幾乎沒有市場。在Toywan停留7、8天後，返程號前往日本，而Barlow所在的實驗號則起錨離開Toywan前往Ffermosa，並留下標誌，預計1個月後返回Toywan。<sup>102</sup>

前往Ffermosa後，Barlow將筆鋒轉向描寫鄭氏政權的歷史，他寫道：「Toywan位於中國沿海的福爾摩沙島上，距離大陸（Maine）約30里格，位於北緯24至25度。」隨後，他開始講述此地的歷史，指出Toywan港（port of Toywan）原先由荷蘭人控制，並在此修建了堅固的城堡。此外，對岸本島（main island，即Ffermosa）上的城鎮也在其管轄之下，Toywan與本島上的城鎮共同構成了該地的主要（chief）港口和城鎮。本島上多數地區需向荷蘭納貢，象徵其受Toywan控制。然而在1664年，一位名為「Coxeham」的人物——在Barlow描述中被視為偉大人物或前任中國總督，且對當時政府相當忠誠——因韃靼人征服（conquered）大部分中國，被迫從一處追至另一處，最終無法找到安身之所，只得帶領大量追隨者，從其原生國家（native country）逃離。<sup>103</sup>

<sup>102</sup> Basil Lubbock, *Barlow's Journal of His Life at Sea in King's Ships, East & West Indianmen & Other Merchantmen from 1659 to 1703*, pp. 218-219.

<sup>103</sup> Barlow寫下的福爾摩沙位置之原文為：「Toywan is seated upon the island of Ffermosa upon

Coxeham帶著他們的財富在距離Maine不遠的小島安頓下來。<sup>104</sup> 這些人被迫離開中國，且不願臣服於韃靼政府，隨著時間推移，每天都有越來越多的人湧向這些已經逐漸無法負荷的小島。於是，在準備好各種中式帆船（China ship）和戎客船（Junk，Barlow描述中屬於兩種不同船體）後，他們啟程，目標直指Ffermosa島，抵達後再前往Toywan港。島上的人向Coxeham抱怨荷蘭的關稅和行為，因此Coxeham最終奪下了荷蘭人的城堡和商館。Barlow略述戰爭過程，許多荷蘭人淪為俘虜甚至被殺。進一步描述到「二年後」（即1666年），荷蘭派出艦隊並與韃靼戎客船合作，企圖再次奪回此島，因韃靼人希望將所有未受其控制的中國人（Chinese）帶回。然而，這次計畫最終敗給了Coxeham的艦隊而告失敗。此戰之後，Coxeham成為「福爾摩沙暨大員國王」（King of Toywan and Ffermosa），所有人能夠在韃靼統治之外相對安穩地生活。不過，為了獲取貨物補給，Coxeham最終決定向萬丹派出使者，並與之結盟。<sup>105</sup> 換言之，此時關於福爾摩沙居民幫助鄭成功軍隊的相關論述已相當普遍。

此外，Barlow描述居住於福爾摩沙的中國人民（China people）祭拜各種不同的偶像和圖像，其中龍的形象更為重要且榮耀——或許這也就是他在旗幟上看到的龍纛。隨後，他注意力轉向中國，但這裡的中國應是指透過臺灣上鄭氏政權的漢人來揣測的中國。他筆下的中國處於寒冷氣候中，位於北緯20至40度之間。男性膚色比英國人膚色略黑；而女性則非常白皙乾淨、長相出眾，只是多待在屋內，可能因此較少曬太陽。女性不能隨意拋頭露面，否則丈夫會相當忌妒。男性穿著長袖長袍，女性也穿著類似的衣服。<sup>106</sup>

---

the sea coast of China about thirty leagues distant from the Maine, in the latitude of twenty five and tenty four degrees north」。參見Basil Lubbock, *Barlow's Journal of His Life at Sea in King's Ships, East & West Indianmen & Other Merchantmen from 1659 to 1703*, pp. 219-220.

<sup>104</sup> 此處的Maine應該是Main之拼寫錯誤，因為William Dampier也曾利用相似的詞彙描述安平，他稱該港在被清軍征服後就被毀去，除了設防於該處外，也要求過去的外國商人都需要前往本土（main）貿易。參見William Dampier, *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 421.

<sup>105</sup> Basil Lubbock, *Barlow's Journal of His Life at Sea in King's Ships, East & West Indianmen & Other Merchantmen from 1659 to 1703*, pp. 220-221.

<sup>106</sup> Basil Lubbock, *Barlow's Journal of His Life at Sea in King's Ships, East & West Indianmen & Other Merchantmen from 1659 to 1703*, pp. 221-222.

此外，Barlow也觀察到中國男子服裝寬鬆，穿長袍，內著短褲，外加長袖罩衫，袖內設有類似口袋以便存放小物品。他們的服飾多以黑、白為主，材質多為棉布與絲綢。冬天時，他們會穿毛氈外衣。頭髮習慣不剪短，而是將長髮盤起，用絲帶綁於頭頂。女性髮型與男性類似，也將長髮盤成花冠狀並以絲帶固定。較高層級的人常手持扇子或陽傘。Barlow還觀察到男性鬍鬚稀疏，甚至驗證了諺語「一個中國人的鬍鬚只有9根」（a Chinaman having but nine hairs in his beard）。<sup>107</sup>

在著名的Boxer Codex中，有關生理人（Sangley，即生意人，為西班牙對中國商人與移民的稱謂）或各種唐人的畫作中，男性裝扮確實都為寬鬆的袖子和長袍，並常手持摺扇。<sup>108</sup> 幾乎同一時期，作為荷蘭東印度公司駐紮在印尼的士兵Georg Franz Müller（1646-1723）也畫下了動植物和人群。他在1683年出版的旅行日記中，就有一幅名為“Depiction of a Chinese man, woman, and soldier”的畫作，呈現男性手持扇子、盤起頭髮，女性則將長髮盤成花冠狀並用絲帶固定的樣子。<sup>109</sup> 同樣情景也出現在《東西印度驚奇旅行記》中：男性手持陽傘，女性手持摺扇。<sup>110</sup> 由此可見，這些不僅是畫作的呈現，而是現場觀察中真實可見的樣貌。

根據Barlow的說法，Ffermosa島的牛肉相當優質，且有各種肉品，包括豬、牛、雞、鵝、鴨和各種野鹿，這些通常經過鹽漬或製成乾物。雖然有些穀物，但產量並不豐沛，不過稻米產量尚可。水果方面，有鳳梨、guofes和一些柑橘類，另外還有像是馬鈴薯、西瓜、蘿蔔、柚子（pompones）等。最重要的是，島上盛

---

<sup>107</sup> Basil Lubbock, *Barlow's Journal of His Life at Sea in King's Ships, East & West Indianmen & Other Merchantmen from 1659 to 1703*, p. 221.

<sup>108</sup> Wang Hanyi (王旻一), "The China Images in Manila: Research of China Images' Illustrations on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Boxer Codex",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594 (November 2021), pp. 604-615.

<sup>109</sup> Georg Franz Müller, *Reisebuch des Elsässer Weltreisenden Georg Franz Müller* (St. Gallen: unknown, 1683), p. 53; "St. Gallen, Stiftsbibliothek, Cod. Sang. 1311," e-codices, accessed March 27, 2025, <https://www.e-codices.unifr.ch/de/csg/1311/bindingA>.

<sup>110</sup> 〈賈斯帕司馬卡爾著《東西印度驚奇旅行記》重刊本〉，收錄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NMTM COLLECTIONS」：<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2.006.0055#lg=1&slide=3>（2025/4/15點閱）。

產糖，為此處最佳的商品，每年固定輸往日本。<sup>111</sup>

這些有關物產的資訊是Barlow最後有關臺灣的記載。在此次交涉後，Barlow乘船離開，向西南航行，沿原路返回萬丹，途經距離交趾支那（Cochin China）不遠、滿布淺灘和礁石的狹窄水道。<sup>112</sup> 根據賴永祥依據商館檔案指出，實驗號與返程號於1672年10月13日在臺灣訂下協約，立下13條規定。其中第五條規定只能在安平貿易，但可在其他「國王治下或未來歸入統治」的港、灣、河、船舶處停靠，獲取補給；不過第七條提醒，除非緊急狀況，否則不應進入基隆港（賴氏原文如此）。隨後，11月實驗號駛回萬丹；隔年1月，駱駝號也離開安平；6月，返程號抵達日本長崎。<sup>113</sup> 此後，由於英荷戰爭，Barlow在東南亞被荷蘭俘虜，關入大牢；隨後，因第三次英荷戰爭，他不幸再次被擄並送往爪哇關押。<sup>114</sup>

實際上，Barlow被擄之後，英國仍持續派遣船隻前往臺灣。甚至在1687年7月29日，Dampier離開澎湖後便起錨航向福爾摩沙南端，不僅調查並提供了臺灣的經緯度，描繪這座高聳且林木繁茂的島嶼，還特別強調此處：

當時英國商人經常造訪那裡，因為那裡有一個非常良好的港口，可以保障他們的船隻安全停泊。<sup>115</sup>

Dampier和Barlow都曾停留於澎湖，但兩人在當時東亞局勢與自身關懷上的關注點有所不同。除了觀察重點與交涉對象各異之外，前者更著眼於停泊的安全、貿

<sup>111</sup> Basil Lubbock, *Barlow's Journal of His Life at Sea in King's Ships, East & West Indianmen & Other Merchantmen from 1659 to 1703*, p. 222.

<sup>112</sup> Basil Lubbock, *Barlow's Journal of His Life at Sea in King's Ships, East & West Indianmen & Other Merchantmen from 1659 to 1703*, p. 223.

<sup>113</sup> 賴永祥，〈臺灣鄭氏與英國的通商關係史〉，《臺灣文獻》，第16卷第2期（1965年6月），頁6-8。

<sup>114</sup> Charles Carlton, *This Seat of Mars: War and the British Isles, 1485-1746*, p. 214.

<sup>115</sup> 該英文原文為：「[was] then frequently visited by English merchants, there being a very good harbour to secure their ships」。該年8月6日，Dampier抵達巴士群島，隨後在此展開極為細緻的調查和命名。參見William Dampier, *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 420-421. 這部分有李毓中的一篇文章詳細地說明，可參見李毓中，〈從臺灣的鄰島到鄰國：西方古地圖中的「巴丹（Batan）」島與「巴士（Bashe）」海峽名稱考〉，《歷史臺灣》，第6期（2013年9月），頁27-48。

易的可能性，以及潛在的深入踏查；後者則更關注山形水勢圖的繪製與當地物產。透過上述資料的對比，也許能稍微窺見當時英國對於澎湖與福爾摩沙的理解與認識。

換言之，身為一位長年遊歷於異文化之間的Barlow，隨船抵達福爾摩沙時，早在出航之前便已對危險的海上生活多有抱怨。他之所以願意參加這趟航行，不僅因為終點是利潤可期的日本，更重要的是能親身踏上40年來未有英國人抵達、觀察的福爾摩沙。從日記中的文字陳述，以及隨後的觀察與紀錄，可以發現Barlow其實懷抱高度期待，希望透過自身經驗去記錄異域世界的歷史、地理與習俗。依據他所的描述和理解，兩座島嶼皆隸屬於「Coxeham」——這位自原生國家逃離、被韃靼人驅離而輾轉至此的人物，最終奪取了原由荷蘭東印度公司管轄的這座島嶼，並於1666年成為「二島」之王。

## 伍、結論

若歸納整理Barlow的紀錄，可以看出他對鄭氏王朝的認知：Toywan和Ffermosa被視為兩座島嶼，其統治者均為Coxeham，即便當時已由鄭經繼位，而其頭銜則是王（King）。至於其統治下的人群，則被描述為不願受韃靼人征服而自China逃離者。這些紀錄或多或少存在歷史事實上的誤差，例如將鄭氏入臺的時間訂為1664年（實際上應在1661至1662年間）。然而，這反而凸顯了Barlow作為一名水手，對異域國度的歷史與文化抱持調查之興趣。或許正因如此，也能理解為何到了1704年，喬治·撒瑪納札（George Psalmanazar, 1679-1763）出版的《福爾摩沙歷史與地理的描述》會引發大眾的關注與討論。當然，筆者並非意指Barlow的紀錄與撒瑪納札的熱潮之間存有直接關聯，而是藉此觀察當時社會對異域世界資料蒐集的興趣，以及其背後潛在的市場需求。

包含筆者在內，有不少學者曾討論過另一幅繪於鄭氏統治時期的《臺灣略圖》，其內容展現了高度的空間相似性與關懷，例如圖中皆描繪了澎湖及變形的臺灣。然而，周全斌所繪製的《臺灣略圖》實際上體現了施琅等人在康熙初年規

劃攻臺路線的指標，因此該圖帶有強烈的戰略性。<sup>116</sup> 相較之下，Barlow的地圖既不具交通功能，也未呈現任何戰略意圖，更非英國東印度公司為航行、貿易而需進行水文測量或精確繪製之圖。它更像是反映了他透過觀察與聽聞所記錄下的文化、地景及各種事件現象。

要理解這一幅圖，就必須回到1670年代的英國，並從當時的時代趨勢來思考，尤其是英國試圖將海圖繪製的主導權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這不僅僅是抄錄或承襲，而是開啟脫離荷蘭壟斷、展開全球調查的一個篇章。彼時英國的社會經濟變革和科學知識追求，直接驅使Barlow選擇這趟危險而未知的航程作為他的下一次旅行：一方面，他希望藉此獲取收益；另一方面，則因為四十餘年以來，尚無英國人親自踏上福爾摩沙，他遂渴望藉機一見這座島嶼。換言之，正是當時的社會氛圍影響促使他踏上這段旅程，進而留下了這些旅行書寫的圖繪與紀錄。

本文多次提及的William Dampier與Barlow曾於1688-1689年間相識。<sup>117</sup> 這兩位活動時期相近的探險家，其留下的資料也呈現出當時不同的面貌：Barlow偏向旅行書寫，而Dampier則延續了Seller以來的調查傳統。因而，若加以比較，或許能發現一些有趣的觀察。舉例來說，1687年7月，Dampier航抵澎湖；在他的描述中，澎湖是一座有人居住的群島，並且「靠近福爾摩沙島，位於該島和中國之間」（lying near the Island Formosa, between it and China），大約位於北回歸線一帶。<sup>118</sup> 較大的差別在於，Dampier因缺乏合適的引水人而未能順利停泊，他同時也表達出希望能進行更深入調查的意願，因此他寫道：

---

<sup>116</sup> 有關《臺灣略圖》的討論，可參見盧正恆，〈賊謀四出廣招徠：鄭氏謀報網、清帝國初期的東南海島認識與《臺灣略圖》〉，《臺灣史研究》，第26卷第1期（2019年3月），頁19-33；近年來仍有學者對於此圖為何人所繪提出不同的看法，與盧正恆說法有所差異，特此說明，可參見楊彥杰，〈《明鄭臺灣軍備圖》研究〉，《臺灣研究集刊》，第4期（2022年8月），頁69-92。

<sup>117</sup> Basil Lubbock, *Barlow's Journal of His Life at Sea in King's Ships, East & West Indianmen & Other Merchantmen from 1659 to 1703*, pp. II, 15-30. 有關於當時英國水手的社會史研究，Bernard Capp的著作能提供相當扎實且饒富趣味的討論，參見Bernard Capp, "Naval Seamen, 1650-1700," in Cheryl A. Fury edit, *The Social History of English Seamen, 1650-1815*, pp. 33-49.

<sup>118</sup> William Dampier, *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 416.

我們駛入他們之中；在抵達前面提到的港口之前，找不到可以下錨的地方。我們對這片水域瞭解甚少，糊里糊塗地駛入，驚訝地看到有這麼多的中國帆船（junks）進進出出，有些停泊著。<sup>119</sup>

由此可見，Dampier的目的性和期許與Barlow明顯不同。透過地圖與文字，我們發現Barlow的重點在於親身觀察與聽聞記錄。他依循船隻抵達之處，在文字和圖像中描繪了Toywan和Ffermosa兩座島嶼的特徵，例如沿海沙洲、島嶼形貌等；而愈接近停泊、能親自觀察的地方，描繪就愈加細緻，甚至將中式帆船的水手與旗幟等細節納入其中。此外，他也因聽聞荷蘭船隻遇難的消息，而在地圖上特意標示出其位置。細讀Barlow的描述，可以看出他對東寧王國在地理空間與歷史發展上的理解與認識。

---

<sup>119</sup> 原文為：「[S]teered in among them; finding no place to anchor in till we came into the harbour before-mentioned. we blundering in, knowing little of our way, and we admired to see so many junks going and coming and some at an anchor」。參見William Dampier, *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 417.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

Journal of Edward Barlow, 1656-1703. Royal Museums Greenwich collected.  
JOD/4/1-98.

Pieter Janszoon van Middelburch. Map of the Western Coast of Taiwan, Tayouan  
and Points North, c. 1636. Austrian National Library.  
Atlas Van der Hem, V. XLI, sheet 4-2.

### 二、史料彙編

不著撰人，《閩海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己編》，第3本。臺北：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1999年。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己編》，第7本。臺北：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1999年。

朱景英，《海東札記》，第2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

江日昇，《臺灣外記》，第5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江日昇，《臺灣外記》，第6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江日昇，《臺灣外記》，第7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江日昇，《臺灣外記》，第8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杜臻，《澎湖臺灣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第2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

周凱，《廈門志》，第15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周璽，《彰化縣志》，第1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

林豪，《澎湖廳志》，第1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年。

施琅，《靖海紀事》，上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

計六奇，《明季南略》，第11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

夏琳，《閩海紀要》，上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顯宗實錄》。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

會，1955-1958年。

戚繼光，《紀效新書》，第16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2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楊英，《從征實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

楊捷，《平閩紀》。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十七世紀臺灣英國貿易史料》。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輿地彙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年。

蔣毓英，《臺灣府志》，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蔣鏞，《澎湖續編》，下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 三、專書

井野瀨久美惠著，黃鈺晴譯，《大英帝國的經驗：喪失美洲，帝國的認同危機與社會蛻變》。新北：八旗文化出版，2018年。

邱岡彥、黃柏源主編，《浩蕩英華：長十八世紀的英國文藝與歷史》。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3年。

島田龍登編，游韻馨譯，《1683年：近世世界的變貌》。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莊勝全，《萬文遙寄海一方：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識》。臺北：稻鄉出版社，2013年。

陳宗仁，《Selden Map與東西洋唐人：地理知識與世界景象的探索（1500-1620）》。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2年。

雷雨晴，《異域之眼：朝鮮王朝對臺灣鄭氏政權的認知與想像》。臺北：秀威資訊，2024年。

鄭維中，《島嶼歷史超展開：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人們與臺灣》。臺北：春山出版，2023年。

Andrade, Tonio. *Lost Colony: 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Beckert, Sven.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4.

Ben-Amos, Ilana Krausman. *Adolescence and Youth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Brewers, John.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 Capp, Bernard. "Naval Seamen, 1650-1700," in Cheryl A. Fury edit. *The Social History of English Seamen, 1650-1815*. Suffolk: Boydell & Brewer, Boydell Press, 2017.
- Carlton, Charles. *This Seat of Mars: War and the British Isles, 1485-1746*.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Davis, Ralph. *The Rise of the English Shipping Industr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2.
- Lubbock, Basil. *Barlow's Journal of His Life at Sea in King's Ships, East & West Indianmen & Other Merchantmen from 1659 to 1703*. London: Hurst & Blackett, LTD, 1934.
- Müller, Georg Franz. *Reisebuch des Elsässer Weltreisenden Georg Franz Müller*. St. Gallen: unknown, 1683.
- Pratt, Mary Louise.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Teng, Emma Jinhua.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四、期刊論文、論文集

- 李毓中，〈從臺灣的鄰島到鄰國：西方古地圖中的「巴丹（Batan）」島與「巴士（Bashe）」海峽名稱考〉，《歷史臺灣》，第6期（2013年9月）。
- 周兵，〈Peter Burke之新文化史〉，《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第45卷第4期（2007年12月）。
- 松冬方子著，杉本房代譯，劉序楓校修，〈唐、蘭風書中有關鄭氏政權瓦解的訊息及其傳日經過〉，《臺灣史研究》，第19卷第1期（2012年3月）。
- 林仁川，〈清初臺灣鄭氏政權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8年第1期（1998年3月）。
- 姜鵬飛，〈歷史上的英國皇家學會〉，《歷史月刊》，第240期（2008年1月）。
- 夏提葉（Roger Chartier）著，楊尹瑄譯，〈「新文化史」存在嗎？〉，《臺灣

- 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5卷第1期（2008年6月）。
- 康培德，〈北臺雙東（東寧國與東印度公司）對峙下的臺灣原住民〉，《季風亞洲研究》，第1期（2015年10月）。
- 張秀蓉，〈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中的臺灣史資料〉，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臺灣史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1994年。
- 曹永和，〈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臺灣鄭氏政權〉，收入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6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7年。
- 郭紅，〈明代的旗纛之祭：中國古代軍事性祭祀的高峰〉，《民俗研究》，2013年第5期（2013年9月）。
- 陳宗仁，〈十六、十七世紀針路簿的澎湖航線分析〉，收入張美惠總編輯，《2021澎湖學第21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馬公：澎湖縣文化局，2021年。
- 陳建元，〈丹尼爾·笛福論風俗改革運動及其改進之道〉，《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67期（2022年6月）。
- 陳建守，〈文化史的由來、實踐及意義——介紹兩本討論文化史的著作〉，《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第44卷第2期（2006年6月）。
- 陳禹仲，〈金融革命與商業社會的興起：18世紀初期英格蘭的社會轉型〉，《史繹》，第38期（2014年6月）。
- 楊佳瑜，〈從英國東印度公司史料看鄭氏來臺後國際貿易地位的變化（1670-1674）〉，《臺灣風物》，第48卷第4期（1998年12月）。
- 楊彥杰，〈《明鄭臺灣軍備圖》研究〉，《臺灣研究集刊》，第4期（2022年8月）。
- 雷雨晴，〈明清之際朝鮮王朝對臺灣鄭氏政權的關注與情報的應對〉，《漢學研究》，第42卷第2期（2024年6月）。
- 鄭維中，〈烏魚、土魷、虱目魚：多元脈絡下荷治至清領初期臺灣三種特色海產的確立〉，《臺灣史研究》，第25卷第2期（2018年6月）。
- 鄭維中，〈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在臺灣周邊海域的水文調查活動（1636-1668）〉，《人文社會及社會科學集刊》，第33卷第1期（2021年3月）。
- 盧正恒，〈賊諜四出廣招徠：鄭氏諜報網、清帝國初期的東南海島認識與《臺灣略圖》〉，《臺灣史研究》，第26卷第1期（2019年3月）。
- 賴永祥，〈臺灣鄭氏與英國的通商關係史〉，《臺灣文獻》，第16卷第2期（1965年6月）。

- 賴永祥，〈鄭英通商略史〉，《臺灣風物》，第4卷第4期（1954年4月）。
- 簡宏逸，〈追蹤甘治士：重建近代初期歐洲臺灣研究系譜〉，《文史臺灣學報》，第16期（2022年9月）。
- 羅樂然，〈朝鮮士大夫對清初海洋秩序重組的情報收集與對應〉，《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34卷第3期（2022年9月）。
- Ben-Amos, Ilana Krausman. "Failure to Become Freeman: Urban Apprentice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Social History*, 16:2 (May 1991).
- Ben-Amos, Ilana Krausman. "Gifts and Favors: Informal Suppor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2:2 (June 2000).
- Brenner, Robert and Isett, Christopher. "England's Divergence from China's Yangzi Delta: Property Relations, Microeconomics, and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2 (May 2002).
- Chakraborty, Titas. "Desertion of European Sailors and Soldier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Bengal." in Marcus Rediker, Titas Chakraborty, and Matthias van Rossum edit, *A Global History of Runaways: Workers, Mobility, and Capitalism, 1600-185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9.
- Earle, Peter. "The Origins and Careers of English Merchant Seamen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and Early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Cheryl A. Fury edit. *The Social History of English Seamen, 1650-1815*. Suffolk: Boydell & Brewer, Boydell Press, 2017.
- Koot, Christian J.. "The Merchant, the Map, and Empire: Augustine Herrman's Chesapeake and Interimperial Trade, 1644-73."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67:4 (October 2010).
- Koyoumjian, Phillip. "Ownership and Use of Maps in England, 1660-1760." *Imago Mundi*, 73:1 (March 2021).
- Lemire, Beverly. "'Men of the World:' British Mariners, Consumer Practice,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an Era of Global Trade, c. 1660-1800."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54:2 (April 2015).
- Mentz, Steve. "'Making the Green one Red:' Dynamic Ecologies in Macbeth, Edward Barlow's Journal, and Robinson Crusoe." *Journal for Early Modern Cultural Studies*, 13:3 (January 2013).
- Pritchard, Earl H.. "Private Trade between England and Chin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2

- (August 1958).
- Schmidt, Benjamin. “Collecting Global Icons: The Case of the Exotic Parasol.” in Daniela Bleichmar and Peter C. Mancall edit, *Collecting Across Cultures: Material Exchanges in the Early Modern Atlantic Worl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
- Smith, Thomas R.. “Manuscript and Printed Sea Charts in Seventeenth-Century London: the Case of the Thames School.” in Norman J. W. Throver edit. *The Compleat Plattmaker: Essays on Chart, Map, and Global Making in England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Steckley, George F.. “Litigious Mariners: Wage Cases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Admiralty Court.”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2: 2 (June 1999).
- Verner, Coolie. “John Seller and the Chart Trad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Norman J. W. Throver edit. *The Compleat Plattmaker: Essays on Chart, Map, and Global Making in England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Wallis, Helen M.. “Geographie is Better than Divinitie: Maps, Globes, and Geography in the Days of Samuel Pepys.” in Norman J. W. Throver. *The Compleat Plattmaker: Essays on Chart, Map, Globe Making in England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Wang, Hanyi (王嗒一). “The China Images in Manila: Research of China Images’ Illustrations on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Boxer Codex.”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594 (November 2021).

## 五、網路資料

- 〈長崎繪〈唐船圖〉〉，收錄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NMTH COLLECTIONS」，  
<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4.020.0067>  
(2025/3/19點閱)。
- 〈賈斯帕司馬卡爾著《東西印度驚奇旅行記》重刊本〉，收錄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NMTH COLLECTIONS」：<https://collections.nmth.gov>.

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2.006.0055#lg=1&slide=3  
(2025/4/15點閱)。

〈明人畫出警圖〉，收錄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精選」：<https://theme.npm.edu.tw/selection/Article.aspx?sNo=04001151> (2025/4/1點閱)。

〈唐船荷揚之図〉，收錄於「文化遺產オンライン」：<https://bunka.nii.ac.jp/heritages/detail/441946> (2025/3/19點閱)。

“St. Gallen, Stiftsbibliothek, Cod. Sang. 1311,” e-codices. Accessed March 27, 2025, <https://www.e-codices.unifr.ch/de/csg/1311/bindingA>.

Jacob Robyn, “Terrarum Orbis Tabula,” Atlas maritimus, 1682, INTERNET ARCHIVE. Accessed May 23, 2025, [https://archive.org/details/bim\\_early-english-books-1475-1640\\_atlas-maritimus-\\_robyn-jacob\\_1682/page/n7/mode/2up](https://archive.org/details/bim_early-english-books-1475-1640_atlas-maritimus-_robyn-jacob_1682/page/n7/mode/2up).

John Seller, “A Chart of the Eastermost part of the East Indies”, Atlas maritimus, 1675, INTERNET ARCHIVE, p76-77. Accessed May 23, 2025, [https://archive.org/details/bim\\_early-english-books-1641-1700\\_atlas-maritimus-\\_seller-john\\_1675/page/n75/mode/2up](https://archive.org/details/bim_early-english-books-1641-1700_atlas-maritimus-_seller-john_1675/page/n75/mode/2up).

John Seller, Practical navigation. Accessed May 26, 2025, [https://archive.org/details/bim\\_early-english-books-1641-1700\\_practical-navigation\\_seller-john\\_1676/page/n5/mode/2up](https://archive.org/details/bim_early-english-books-1641-1700_practical-navigation_seller-john_1676/page/n5/mode/2up).

William Dampier, 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 416, INTERNET ARCHIVE. Accessed June 19, 2025, <https://archive.org/details/newvoyageroundwo00damp/mode/2up>.